



魯迅先生遺著

魯迅回國憶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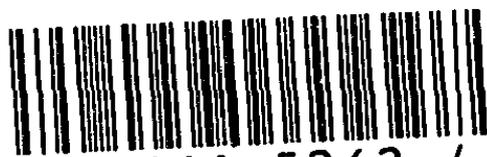
20.5.19 山子集松梁溪榮安寺



魯
迅
回
憶

荆
有
麟
著

荆
有
麟



3 0661 5262 4

目次

題記	一
母親的影響	五
魯迅的個性	九
魯迅的對事與對人	一七
魯迅避難在北平	二五
魯迅教書時	三一
魯迅與世界語	三五
魯迅的嚴謹與認真	三九
魯迅論愛羅先珂	四五
有趣的會談	五一
魯迅的生活和工作	五七

魯迅的婚姻和家庭	六七
魯迅論國父	七五
「吶喊」自序索引	八一
「金心異」考	八九
京報的編起	九三
「哈哈論」的形成	一〇一
「語絲」的發刊	一〇五
「莽原」時代	一一七

題記

民國十三年，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聽先生講：「苦悶的象徵」的時候；有一天，我爲勞動文藝研究會所出版的「火球週刊」寫了一篇文章，自己不大有胆子敢於拿出去，便懷着虛心，初次拜訪先生的寓所了，記得先生在聽了我的來意後，不特接受了代爲修改文章的請求，還鼓勵着：「要多看書，多寫作，慢慢就會進步的。」

由此開頭，我無論寫作或翻譯，每篇都送給先生去過目。有時一個形容詞不知道應該怎樣表出，或者某一個字不知道該怎樣寫法，我便將她空起來，先生在看時，總是代爲填進去。從此，凡我在北京時代，爲各雜誌報章所寫的一切東西，——我想只能稱爲東西罷——完全都經過先生的過目與修正。事實上，浪費先生的精力，又還不祇此，等「民衆文藝週刊」由我負責編輯時，是連外面投來的稿件，一律都送給先生去校閱。

這樣，由十三年到十五年，在這整整兩年的時光中，我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先生之門，不特聽多了先生的談論與意見。也熟知了先生的日常生活同家庭情形，直到先生離開北京爲

782.88

814-503

2

1

記

題

止。

先生離開北京後，我也爲了生活而到處奔跑起來。此後，不特再未寫東西，送先生去修改。數年中，連與先生謀面的機會都很少，直到十八年，我在南京失了業，才有機會跑到上海去看先生。那次在上海，就住在先生景雲里的寓所裏，白天同先生及景宋女士逛馬路，坐咖啡店，晚上便在先生家中談閒天，吃糖菓，雖然祇是短短的幾天功夫，但其間，還有機會陪先生到江灣立達學園，去聽先生關於文學方面的講演。

此後，我很少去上海，記得在報上看見先生靈耗時，我正因職務關係而跑向西安。直到先生去世後兩三個月，我才到上海，由景宋女士引導，拜謁了先生的陵墓。然而，先生已不再向我指示什麼了。

先生的早死，可以說定中華民族的大損失，因此，在先生瞑目之後，便爆發了全國性的大哀悼。這些哀悼或議論先生的文章，很多是最公正的評價，但也有惡意的調侃。我在涉獵過一些冰捧式怪論之後，我不願——不，是不忍寫一個字有關先生的文章。因爲我當時腦中浮出了先生的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鑿託知

己，是非難起。既以自銜，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全集六卷七三頁憶草素園君）

二十九年冬天，某一個晚上，我在重慶附近鄉間，遇見了久別的孫伏園兄。記得在談到先生時，伏園說：——

「好像還欠一批債沒有還清似的。總覺得關於先生什麼，應該寫一點出來」。

一想，不錯，社會上盡有能使用先生在地下裂齒的關於先生本身事故的文章，但研究先生者，究竟還有許多人。於是我決意將我所接觸的先生，藉了記憶力所及，拉雜寫出一些來，以供真實研究先生者的參考。

這是三十年春天的事情。

初開始寫時，我一點徵證的資料都沒有。不必說先生的譯著，因了抗戰後的逃難，手頭不曾存有一頁半本。即有名如先生的終身老友許壽裳先生所寫極富研究價值的：「悼亡友魯迅」。「魯迅的生活」等。我都未曾看到過。故記事中之「魯迅的個性」，「魯迅先生教書時」，「魯迅與世界語」，「魯迅的對事與對人」。「魯迅的生活和工作」等等，僅靠個人記憶而寫出。殆後，郭沫若先生借給我「魯迅全集」，使我又憶起許多事故。故又繼續寫了：「吶喊自序索引」，「魯

4
迅的婚姻和家庭」，「魯迅所關懷的丁玲」，「有趣的會談」，等等。

但不論是全靠記憶，或由先生的文章而引出的事故，其着重點，是在記述先生平素的言談與行動，而不大爲外人所知者。因爲我上面已聲明過：發表這些斷片，不過是爲供給某些朋友們的參考而已。

其間，承歐陽凡海兄的指示，使我改正了一些錯誤。司馬文森兄的督促，使此書得早與讀者見面。這裏一并申明我至誠的謝意！

一九四二、八月三十日於渝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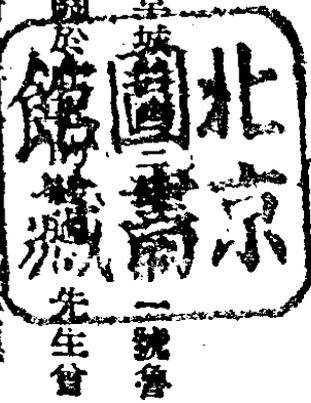
母親的影響

北平師範大學某生，因為受了刺激，曾冒充楊樹達教授名義，跑到皇城
迅先生的寓所，大興問罪之師。這是先生剛剛遷進新居時的事情。——關於
在第一期語絲上有楊樹達之襲來記——以此，頗為迷信的先生的母親，對於新居，竟生了厭惡，
而對於先生隨便接待來客，也不很贊成了。會記詩人柯仲平第一次訪先生時，帶着大批詩稿，先
生因其係初訪的生人，便接待於客廳。（此間南屋，實係書屋，三面牆都擺滿了書架。不過先生
從不在此房工作，若有生客，即接談於此，故暫名客廳。）略談一會之後，仲平便拿出他的詩稿
，向先生朗誦了，聲音大而嘹亮，竟使周老太太——先生的母親，大為吃驚，以為又是什麼人來
吵鬧了。便喊我立刻過去看看，並且還叮嚀着：

「要是胡鬧的人，讓他走好了，不要大先生同他再吵了。」

待我看到是在讀詩，才回頭告訴老太太，老太太說：——

「可是個怪人吧！我聽老媽子說：頭髮都吊在臉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來，大先生吃他的虧



這可見周太太對於兒子的關心，雖然那樣大的年歲了，她還是不放心。

事實是：老太太不特對於兒子的愛護，就是對於兒子的思想及學問，我以為影響也是很大的。

自從先生回國任事以來，家產雖沒有像老太太的希望：中興起來。但先生也會在教育部擔任了薦任官吏。在當時儉樸的生活下，以先生之所入，供給家庭，是頗有餘裕的。因此，老太太也不必像以前一樣勞作了。但老太太是認識字的人，又閑不住，便設法搜集中國的舊式小說看，越看越有癮。俟後，竟成每日的功課了。老太太初到北京，是住在西直門八道灣。那時先生的二弟XX，尙與先生同住，故老太太的讀書責任，便由他們弟兄兩個負，魯迅先生代老太太到處找書看。XX也代老太太到處找書。待後，弟兄兩個分居。而XX又不願見老兄，竟連老太太也不來看。於是老太太的讀書，便由魯迅先生一個人負責了。而老太太看書，又祇限於小說故事一類的東西，而且不看外國的翻譯作品。這就很使魯迅先生大為困難了。頂多一星期，便會聽見老太太說：——

「大，我沒書看了」。

於是魯迅先生便得忙着到處找，有時，雖然買到了，而老太太却說：——

「大，這本書，我看過哉。」

於是，還得再去找。

因為老太太愛看小說，先生家裏的藏書，中國舊小說，就特別地多，而先生又是勤勉過於勤勉的人，凡為老太太買的書，他必先看一遍，因為據先生講：——

「老太太看書，多偏於才子佳人一類的故事，她又過於動感情，其結局太悲慘的，她看了還會難過好幾天，有些缺少才子佳人的書，她又不高興看」。

這却是實情，記得在吶喊出版後章衣萍夫人吳曙天女士將吶喊送給老太太看，而且在老太太面前，指明故鄉一篇特別好，老太太馬上帶起眼鏡，去讀故鄉，故鄉一讀完，原書交還吳女士，還說：——

「沒啥好看，我們鄉間，也有這樣事情，這怎麼也可以算小說呢？」

說的在座的人都笑了。因為根本，老太太不知有吶喊出版，更不知吶喊裏的故鄉，就是她的兒子寫的。

雖然周太太在讀書的意見上，對於兒子似乎沒有影響，但實際，影響是大極了，魯迅先生

自己就講過這樣的話：——

「因為老太太愛看書，我不得不到處搜集小說，又因為老太太記性好，改頭換面的東西，她一看，就講出來：說與什麼書是相同的，使我曉得：許多書的來源同改裝。」

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就都是在這影響下，而研究，而整理，而公諸社會的。

因為老太太對她的兒子愛護及影響，在魯迅先生自己，對於母親，亦是百依百從，——雖然在思想上，母子是相離太遠了。但先生對於家事，多半還是依了老太太主張，先生曾經這樣講過

：——

「她們的成見，比什麼都深，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頂多只能改變十分之一二，但沒有多少時候，仍舊復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她們簡直不了。真沒辦法」。

如此感慨的先生，雖然對母親有此不滿之詞。但這是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和憎惡，並不是違反了人性，對母親有何不敬，在先生的家庭中，年常四季。無論什麼時候，都能從老太太房中，拿出各色各樣的點心、水果、或者其他零星食品。而且都是先生親自在街坊買來的。這可見先生對母親的敬愛一般了。

一九四一、七月、重慶。

魯迅的個性

作爲一個思想家，他要沒有獨立的卓越遠見，那，他的思想，一定會墮入傳統的因襲中。同樣地，作爲一個文藝家，如果沒有超凡的意見同風格，那，他的作品，也會墮入世俗一道的，在這樣的意義上，我想來說一說：魯迅先生的個性。

魯迅先生出於世家，而在幼小時，家道即中落，那時節，他正十三四歲。以中國人年齡論，他剛剛懂得社會人情。恰巧這時，他得時常出入於質當店，不特受着質當店朝奉的白眼，與他同年齡的一般小孩子，以及鄰居街坊，都會給他一冰冷的奚落，魯迅先生在這一點上，定受了很大的創傷。終於使他不得不菲薄衆議，違反母意，跑到千里外的南京，投考洋學堂——江南水師學堂，魯迅先生獨立的個性，這裏已開始發煥了。

他的個性發揚，由此作了起點，此後，便是一直發揮着，總在尋找自己的道路。水師學堂不高興，又轉路續學校。路續學校畢業，又去到日本學醫，學醫僅能醫肉體，使他又覺得：先有醫靈魂的必要，終而研究文藝，在思想界動起干戈了。

由於先生的個性發揚，可以說他，對於任何人都不容易相處。如果那與他相處的人，是走向與他相反的道路的話。但因他的個性發揚，不是孤獨的傲慢自大，而是對於封建勢力的堅強反抗，所以什麼人也都與他容易相處，只要是志同道合。下面，我將所知的先生對人對事各方面，舉些例證，以作研究先生者的參考。

×××是先生的二弟，原同居於北平西直門八道灣寓所，自十二年兩人翻臉後，至先生終期，再未與其弟講過話，其間在北京大學教員休息室，雖常碰頭，但一接觸，即起爭執，其對乃弟之厭惡心性，可見一般。可是×××，當時在思想上，是與先生起着共鳴，因此，北京報紙雜誌，幾次大筆戰，如科學與玄學之爭，如青年必讀書問題，如女師大風潮問題等等，凡有自命爲正人君子之流，對於×××議論，有所攻擊時，先生也曾用過各種筆名，代×××應戰，這可看出：先生雖然厭惡×××之爲人，但對×××當時之思想，還是支持的。這是一般普通人所難於達到的。因爲平常的理性是：只要討厭某一個人，任他作什麼有益於人類或社會事業，也會激起討厭的情感。不是說他如此作，定是別有居心，便是說他那樣作，定有什麼背景，而先生在這一點上，他是依照了他的看法而動作，把那人的過去，總先擺在一邊。

其次是：先生當時擔任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這學校裏的學生，完全攜單在政治活動中

，記得當時學生中分三派，國民黨，共產黨與無政府黨。因為有這些黨派關係，在第二學年，便暴發了不可收拾的學潮，整整鬧了半年，學校還是無法上課。於是有些人，便找代理校長譚熙鴻，預備另外成立一外國語專門學校，以結束其風潮。當時會邀請與學校有關之董事，教授等，在中央公園開會商決。先生為教授之一，自亦參與其會，會議中，多數以為為解決風潮起見，還是另改學校名稱，學生從新舉行登記。此主張，以馬夷初主張最力，後來李石曾提出：為防止再有風潮起見，學生中，凡係某黨某黨，一律不予接收，先生以此，有失教育青年之旨，便激烈反對，始遭打銷。事後，先生曾說：——

「石曾先生革命精神是可佩服的，但他那種方法，我却反對。革命不能不估計犧牲，因革命是為拯救大多數。犧牲少數，自然可以。若犧牲多數，所解放者，僅是少數，那我一向是不贊成的。」

這也可以看出，先生對於自己的主張，是怎樣堅持了，雖然與先生主張不同的，是先生一向佩服的石曾先生。

因了先生有那樣獨立的堅強個性，所以先生作起事來，絕不為威武所屈。

會憶十四年，女師大風潮發生後，先生不贊成該校校長楊蔭榆女士的開除大批學生的辦法，

便在北京雜誌上，爲學生聲援，而楊蔭禮之所以能作女師大校長，因爲她的朋友章士釗，是當時的教育總長，於是她便以魯迅攻擊她的文章，哭訴於章士釗之前，不幸的是：魯迅先生當時選任教育部僉事，章士釗不顧是非公理，竟公報私仇，下令將先生免職，但先生到教育部任事，起自夙元，而先生所任之僉事，又係薦任官，依照官規，薦任官之任免，須呈請大總統，且老職員，若在公事上無重大過錯或觸犯刑法，是不能隨意免職的。但先生竟因作公事以外的文章，而被免職了。依常理，總長爲內閣閣員，在黑暗的當時北京政府，本可任所欲爲，免一個區區僉事，甚爲平常。在旁人，若被免職，只有掩飾蓋走路之一法，然而，先生實行反抗了。他向平政院提起訴狀，控告章士釗違法，記得當時訴狀上，曾指明章士釗手諭免職令，爲某月某日，而免職令理由是說先生參加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有礙部令，但先生參加校務會，是在章士釗下手諭之次日，章士釗總不能預知先生的行動，而先予免職吧！其爲挾私無疑矣。控訴的結果，先生竟勝利了，府令仍令先生官復原職。——雖然先生因總長仍係章士釗，再不高興去到教育部辦公，但先生不畏強權之精神，已完全表現出。

但還不止此也哩，先生個性發揚之結果，不特不畏強權之壓迫，且不逢迎任何權貴，曾經有過以下的故事：——

十八年春天，先生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時，應黃埔軍校之約，前往講演那有名的「文學無用論」。講畢，有某政治家，約先生前往其官邸吃飯，先生再三推辭不掉，只得前往應酬，酒席自然是很豐美的，但在吃飯時，先生發覺主人，雖對自己再三恭維，但實際，是什麼也不懂得的俗人，更不必談文學了。自然，主人所談的對於先生的講演，怎樣佩服，怎樣同感，完全是假話了，先生於是很討厭起來，剛巧上來一道菜，主人對於此菜，特別稱道其好處，並說明：此菜係某先覺所喜食，而此菜之製作人，就係爲某先覺作菜的原廚子等語，在旁人，得到這樣的恭維，除了隨同主人讚美菜好而外，恐無別話可說了。而先生當時連筷子都不動一動，竟說：——

「我就是不喜歡吃這一樣菜」。

其不喜逢迎人，可謂到極點了。

可是，這一外，還有更怪的故事呢。

大約是民國十八九年罷，先生有個既是同鄉，又是同學，而且平素還常同先生往來的某君，忽然作了大官了。有次到上海去看先生，先生竟由後門走出，避不見面，只讓娘姨告訴客人，說主人不在家，而某君又係曉得先生脾氣的人，便在先生前門附近徘徊起來，大約等候了有半小時

以上，先生又由後門回來，在樓下堂屋講話，某君聽見了，便一下衝進去，先生要再躲，已是來不及了，而某君還說：——

「哈哈！我曉得你在家呢」。

先生當時雖然有點窘，但也即刻答覆：——

「你不是已經作了官了麼？」

某君曉得先生的意思所在，便接着說：——

「作官歸作官，老朋友總還是老朋友呀！」

兩人才一同上樓去談天。

類於此的事，在先生，是很多很多，我現在再舉一件，作為這篇小文的結束吧。

民十三，中山先生北上後，給青年界以很大的刺激，但缺乏的，是理論的指導，同真確的消息報導，於是國民黨當局，決定在北京辦一國民新報，已故中委邵元冲會面請先生代寫文章，此事被未名社幾位朋友曉得：決定活動國民新報副刊，於是山某君出面，要求先生寫介紹信，同時又找正在辦猛進的北大教授徐旭生先生亦寫介紹信。可是，某君的話，是兩樣講法，他對徐旭生先生說：是魯迅先生要求徐先生介紹韋素園去編副刊，而對魯迅先生則說：是國民黨方面要求先

生介紹一位副刊編輯去。總之：兩方面都寫了介紹信去，事情算是成功了，便由素園出面去編輯，魯迅先生還代他各方面拉稿，後來不知道怎樣一弄，魯迅先生知道了某君兩樣話語，竟非常之生氣，說：——

「你看，他竟到我這裏玩手段來了」。

俟後，便再不與某君講話了。直至他死時為止。

一九四一、七月、重慶。

魯迅的對事與對人

魯迅不大拿出批評家的派頭，去批評某一篇著作或某一個人。但是，他的雜感，論文和小說，甚至於散文詩「野草」，却沒有一篇不是充滿了批評的態度。我們只要翻檢一下，從五四後，直到他死時為止，文壇上一切潮流與現象，都會發現在他的筆墨中。

他的批評，有時只是一鱗半爪，但就只這一鱗半爪，那深刻性，却要比了洋洋數萬言，還要有力的多。下面便是一個例子。

北京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在脫離了晨報，而去主編京報副刊時，剩下的晨報副刊，便由詩人徐志摩來接編了。徐志摩是伏園的朋友，所以他們倆，雖編着幾乎可以說是敵對的報紙，但並沒有因此減却他們倆人見面的機會。相反地，因為志摩也編着副刊。爲了拉稿的關係，倒容易常常與伏園碰頭。因此，他們倆便相互交換着意見，交換着批評，甚至交換着旁人對他們所編的副刊的好惡消息。

有一次，志摩寫了他那有名的雜感式論文：「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當時是志摩正向社

會活動的時代，每月用茶點召集着賢人淑女的新月會議，在北大等校，又講授着英國歷史上的詩人——拜崙與濟茲，而他的表揚他的客廳的新詩——「石虎胡同七號」，也正起着引誘青年去拜訪的作用。但他却忽然高興，發表起有關政治的論文，多事的伏園，便將志摩的「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拿去給魯迅先生看，而且在魯迅看完後，還問了魯迅的意見。過幾天，志摩又與伏園相見了。志摩便問起：他那篇文章，不知魯迅先生的意見怎樣？伏園便直爽地答：——

「魯迅先生說那篇文章寫的真好！」

然而，正以詩人在文壇上爭輝的志摩，感覺到魯迅的諷刺的批評了。他立刻說：——

「他罵得我好苦呵！」

這是一件。另外一件，使我憶起了許欽文。

許欽文約在民國十一二年時候。陸續在北京雜誌報章上，發表他以學生為題材的短篇小說，記得在他的第二個集子出版後，他挾着初印成的樣本，與某氏兩個來訪魯迅先生了。某氏當時，講了一個笑話，他說：——

「欽文的第一集短篇小說。只有一個青年太太買了一本，而且看後，到處對人講：說她佩服的不得了。甚至表示，想同欽文作朋友。」

魯迅當即對欽文說：——

「那以後再出新集子，我看你還是送她一本罷，不必再要她買了。」

某氏却說：——

「那可糟糕！欽文第一集小說，就賣掉一本呵！」

在場的人，都笑了，魯迅先生也笑了，在笑聲還未了時，魯迅又對許欽文說：——

「那不要緊！你更應該送她。爲保持你的利益起見，我這裏一本，可不必送了，反正我總得買。」

在欽文與某氏他們走後，我問先生對於欽文的小說意見，先生嚴肅地說：——

「在寫學生生活這一點上，我不及他。」

因爲先生不肯輕易讚許人，但也不肯輕易指責人。所以對於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從來沒有扳起面孔，寫長篇大論的批評，某人如果有一點可以指責，先生就指責那一點，某人如果有一點可以讚揚，先生就讚揚那一點。會憶「莽原」時代，先生所讚取的幾個青年，如高长虹，李遇安，黃鵬基，韋叢蕪，向培良，韋素園等等，先生就分別地，曾講出他們某一點的可取來。而當時先生所嫌惡的幾個青年作者：如沈從文——當時名休芸芸——，歐陽蘭，張友聲，黎錦明等等，

先生也會指出他們的思想，態度上，技術上種種的不正與缺點。然而，先生並不是死抱成見的人。在高長虹出着「長虹週刊」，表示要獨霸文壇的時代，先生也不容情地起來打擊他了。而沈從文一到與丁玲辦「北斗」的境况，先生也從旁贊助他們了。倘使志摩現在猶生，如果他跑到前線，能將大別山或者中條山的血淋淋的戰鬥事實，用他的大筆，寫成歷史式的紀念碑，——史詩。那魯迅先生也許真要稱他為詩人了。

但先生是疾惡如讎的。一個人不大公正的態度，倘不改變，先生是老記着他，因為先生不是神仙，是人。他有一切人們的感情與生活。他處在落後的中國社會，他接觸着社會各種黑暗現象。他的思想，行動，當然不能不受現實的影響，下面幾件例，是可以看出的。

先生的第一集小說「吶喊」出版後，創造社的成仿吾，曾給了不大公正的批評。——聽說仿吾在延安一次講演裏，曾聲明取銷了他那批評，主張對魯迅再認識，可惜魯迅已死於地下，不知仿吾之聲明了。——雖然先生的不肖弟周豈明，在某一篇文章裏，也回敬了成仿吾一下，指出成仿吾的客觀與主觀的兩用法的錯誤。但先生並不能因此而釋然于心，我們曉得：先生與創造社人往來，是非常之少的。除了郁達夫外，其餘可說很少了。成仿吾那一次不很客氣的批評，使先生耿耿於心者，達至十數年。無論談話裏，文章裏，一提起創造社人，總有些酸腐指摘或諷刺。雖

然這指摘或諷刺，另有牠的社會原因在，但仿若那篇批評，却在先生的腦筋中一直記憶着。記得民國十八年春天，我到上海去看先生，當時有人通知先生說：創造社要在他們北四川路的書店樓上咖啡座開會，商議對付魯迅，先生立刻興奮了，在開明了開會時間之後，一到吃過中飯，先生便說：——

「走，我們到創造社咖啡座搗亂去，坐在他們面前，看他們怎樣對付罷。」

於是先生及他的愛人許廣平，還有喬奉和我，一同走進創造社的樓上咖啡座去，剛巧，咖啡座在屋中間擺起長台子，先生就邀我們坐到長台上，而且還說出任什麼人來也不讓的話來。

幸而，坐了整整一下午，來客雖是川流不斷，但並沒有說明，要長台子開會，教我們讓出的話來。於是，在電燈已亮，要吃飯的時光，我們才在笑聲裏，走出了創造社咖啡座，在歸途中，先生還說：——

「什麼也不怕，怎樣來，就怎樣應付，他們就莫可奈何了。」

可是，計算時間，離成仿吾批評「吶喊」時，已有五七年之久了。

還有一件，是北京京報副刊，向全國學者發出徵求指示青年必讀書。當時應徵的，當然是很多的。有的勸青年讀經，有的勸青年讀幾何學，真是洋洋大觀，美不勝收。而魯迅先生的應

後，則竟說：——

「我勸青年人多讀外國書，少讀中國書，甚至不讀中國書，因為……」

他雖然在因為之下，還說了外國書多是入世的，而中國書多是出世的理由。但有人反對了。開始發表意見的，是一個中國大學名叫熊以謙的學生。由熊開頭。接着維持世道人心的國粹家都出來了。這場筆墨官司，打了好幾個月。先生勤奮地應戰，一直沒有表示休息的樣子，因為據先生當時說：——

「你只要有一篇不答覆他，他們就認為你失敗了。我就篇篇都答覆他們，總要把他們弄得狗血淋頭，無法招架，躲回他們老巢去為止。」

在此事過後的四五年中，我在上海一個友人處，忽然碰到那筆戰挑動者熊以謙，高高的個子，紫紅色的臉，講話總是慢吞吞，看樣子，倒是非常老誠的青年，於是在碰到魯迅時，便把我看見熊以謙的事，告訴了他，不料先生竟說：——

「你說他老實麼？那就是他騙取社會同情的手段。凡遺少，都有那一手，怎麼樣？現在還在上海麼？喊他來，我把他腦子中的中國書蟲，都要打乾淨。」

可惜，我當時沒有帶熊以謙去看先生。否則，不知道先生要怎樣教訓他一頓呢。

再有，類於此的事，就是先生對於他的朋友胡適之博士，總是抱着反感，無論寫文章或談天，對胡博士的態度總是不敬，兩人雖然也常常開玩笑，但先生的話，却是帶刺的時候多。就如先生南下教書，由廈門而廣州，而上海，其間已有五六年，他們未曾再見面，但先生忽然跑回北平省親去了。在北平，還又到處講演起來。在一個場合中，他們兩人相會了，胡博士說：——

「你又捲土重來了。」

魯迅先生答：——

「我馬上就捲土重去，絕不搶你的飯碗。」

弄得胡博士只能說：「還是老脾氣呵！」

而魯迅則答：——

「這叫至死不變！」

因為當時胡博士忽而反對國民黨，忽而又預備作官。魯迅便不客氣地諷刺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重慶

魯迅回憶斷片

24

魯迅先生避難在北平

自從五四運動後，中國青年已痛感政治環境不特可以決定自身的命運，連整個民族的命脈，都繫在政治環境上。因此，遇了政府有措置失宜的舉動，青年人再不像以前，低頭讀死書了。總是揚起驚天動地的大運動。到民十三中山先生北上，更覺醒了青年對政治更進一步的認識，而在北平的學者，如李大釗、李石曾、徐謙等等，當時又都是熱心此種運動者，以此，全城大遊行略，天安門羣衆大會略，都隨着政治的波動而常常舉行。爲了大沽口洋船事件而舉行的示威與請願，終於演成「三一八」，不過是青年過問政治運動中的一件事而已。

但這一事件，却不同於其他事件。

- 一、這次羣衆跑到執政府門口，說明是請願。
- 二、段執政不特不出來對青年作負責的答覆，反而令衛隊開槍。
- 三、當局殘殺了青年之後，反誣譏青年，說青年是準備暴動，請願時帶有煤油、手槍、木棍等武器。

這會激起北平各大學教授及文化界人士的憤怒，於是雜誌報章一致的反對政府的暴行。魯迅先生便是反對這次暴行的最有力的一個，他不特寫了那有名的悲憤文章——紀念劉和珍女士之死——發表到社會上，他還與李石曾，馬鈺倫等教授們，在中央公園有過一次集會。商討怎樣應付及怎樣反對那種暴行。

這一來，執政當局的真面目，終於拿出來了。不特頒佈明令，嚴禁一切集會，還開了五十一個教授的名單。要軍警一律緝捕。手無寸鐵的教授們，不得不暫為躲避起來。魯迅先生的避難，就是這樣發生的。

五十一個教授的名單，還沒有傳到軍警手裏，大多數的教授們，已經曉得了。當時第一個通知魯迅先生的，是北大哲學教授徐炳昶。再其次，是×××托人轉達。魯迅先生便動了離寓的念頭。

先生避難的第一個去處。是北平西城，錦什坊街九十六號莽原社。當時莽原社僅有兩間房子。我住一間，另外一間，作會客，辦事，吃飯之用。先生在一個暖和的中午，突然來到了。於是，我便將自己住的一間，讓給先生住，我移到外間去。我每日仍照常上課。去報館編社會新聞。先生便在家看書，寫東西。到晚上，先生總要出去到東城轉一趟，打聽打聽當天政治上的特殊要聞。

住到第三天，突有三四個青年，來訪莽原社了。據云：係對於莽原崇拜，特地來訪問，看收不收外稿。當時我不在社，而來人又不認識魯迅先生。先生便故意裝的像個鄉巴老，說他一切都不懂，非等我回來，無法答覆他們的疑問。訪問者悻悻而去了。先生疑心那些訪問者，是偵探改裝的假學生。深恐他們再來打麻煩。於是在第四天極早極早的早晨，先生裝着病人，我攜帶着先生隨身的零星用品，將先生送往石附馬大街的山本醫院裏。

先生不知爲什麼，在山本醫院住了只有四五天，在我最後一次去看他時，他已經留條子而去了，並要我到德國醫院去一趟。

我第一次到德國醫院，先生真的病起來了。獨自住在一個很小病房裏，床前茶几上擱着藥瓶，據說：是腸胃病，消化不良。每天就只吃醫院給病人所規定的無鹽無油的淡飯、麥粥、牛奶、莫名其妙的蛋糕，先生說：這種飯，即使沒有病的人住下去，也會吃出病來，他實在不能下嚥了。要我代他買些有鹽的東西來。東西，當天就給他照買了，記得當時所買的四塊火腿麵包，先生一下子全吃完了。

第二次去醫院訪先生時，先生已脫離病房，與其他避難的教授們，同住在一間大房子，我去時，房裏人亂紛紛，正在圍聽有人剛由外面帶來的最新消息，似乎是說：當局計劃搜查被緝的教授

們的家庭。這消息，當然是一個打擊。先生當時也很爲着急，於是聽了當時在場的戴應觀之勸，交給我五十元，要我把他老太太及太太暫接出寓所躲避。我在東長安街東安飯店裏，代定了一個房間，然後將周老太太及太太接送到飯店裏。同時，受了先生囑託，又將先生存在家裏的書籍，檢查一遍。幸而先生不是研究政治經濟的，所以各種主義書籍還不多。略微抽出一部分，連同一些必要保留的信件，一并送到一個熟識的米店裏暫存。然而；周老太太又怕家裏兩個女用人出毛病。結果：我晚上就代他們看家了。但搜查的事，並沒有實行。所以本來住不慣旅店的周老太太及周太太，在聽說沒有什麼事故發生時，幾天就要回家去了。但先生本人，這時却又由德國醫院轉到法國醫院了。爲的是：德國醫生們不大贊成無病的人在醫院多住。大家只得另找安隱地

。法國醫院是比德國醫院自由得多。避難的教授們，在樹下花前散步看書；李石曾與馬敘倫等，在屋中圍棋。至魯迅先生，則正爬在一個小桌上，寫答覆上海友人的來信。這時節，有人傳出消息，說不特執政府對於教授們不願追究了。連奉軍當局，也表示不願追究了。於是胆大的教授們，便開始向東交民巷以外的地區走動了。魯迅先生因神情不安，難於工作，再加以經濟上無法支持下去。（先生因避難已借貸數百元）便決定仍回到西三條胡蘆的本寓去。在五月的一個早晨

，太陽剛剛放出紅光，先生已由東交民巷趕到西三條二十一號。「碰碰碰」在打自己的大門了。

一九四一、九月、

魯迅先生教書時

一個江浙籍的人，如果能在北平證長久時間，對於北平話再肯留意，那他講起話來，雖不及老牌北平人講話清朗，乾脆，但後音略帶一點江浙味道，而吐字又很真切，聽起來也是滿好的。魯迅先生講話，就是這樣的。這是一點。

還有一點，是一個人要有幽默感，如果一天到晚，板起面孔，無論對於什麼人先拿出教訓的態度，或者仁義道德的講空話一堆，大抵聽的人，也會頭痛的。而魯迅先生就剛剛取了相反的態度，不論講什麼，他是要將那奇異的特點，用常人所不大應用的語句，形容出來。聽的人便會起一種興味感。

再者，就是魯迅先生是博學而又多能。他受過軍事訓練，學過採礦回醫藥。研究的是文學與藝術。他作過學校校長及教職員，當過長久的政府官吏。因有此種種經驗與實生活。所以無論他講什麼，不管是引證或比喻，那材料要格外豐富而生動。

因有以上三種條件，魯迅先生在學校教課，便獲得空前的成功了。

先生教課，是從民國九年開始的。當時教育部職務甚清閒。北京大學馬裕藻要周作人去講中國文學史，周作人又轉抽先生。先生慨然應允了。但先生因有教育部職務在身，不能作教授。便擔任了北京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當時名高等師範）的講師。在這兩個學校裏，一直教到十五年離開北京時為止。其間十二三年又擔任了女子師範大學及世界語專門學校的講師。到十四年，更擔任了中國大學的講師。俟後，燕京等大學，雖曾託人請先生任教，但先生以時間及交通的關係，終未應允。

十五年因環境關係，不能在北京安居了。應了林語堂之請，赴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因學校當局不肯拿出已答應過的設備及計劃與夫人事上的不調，先生乃走廣州，剛好朱家驊正在廣州中山大學幫戴季陶校長忙，乃請先生担任中山大學之文科系主任，在先生應允之後，又以教務主任相託。與在廈門大學一樣，先生因不滿學校當局之措置，立刻辭職。後來到上海，先生便快心於教育事業之不易作，便決計不教書，記得在上海時：光華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勞動大學等等，皆曾請先生教書，先生以時間及健康為理由，統通辭謝了。在先生本身，不教書，當然可免去時間浪費之苦，但有許多敬仰先生的青年，竟因此而失掉聽取先生獨到的偉論的機會。亦不能不說是：大部分青年的悲哀。

在廈門與廣州，先生在校所教授的，是什麼東西，我不大明瞭，在北平各大學，先生所教的，是他有特殊研究的「中國小說史略」，及先生所譯的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先生當時所用的講義稿，根本不會要各校印過。是給先生出版的印刷所，依照了所排的板本樣，用中國出產的水廉紙，單面印起來。（水廉紙正面有亮光，背面粗糙，）先生在上講堂之前，交由學校教務處散發。可是先生的講義數目，是依照學校選科人數散發的。而聽講者，無論在那一個學校，都有非選科的學生自動來聽講。甚至在北大，每次遇到先生講課時，連校外人都有許多去聽講。講義不啻是小事，校外人將課室常常坐滿，而選先生課的學生，反無座位可坐，亦是常常有的事。而學校其他學院或其他學系的學生，有時來了找不到座位，找不下站位，坐在窗台上，又是常常有的事。先生對於青年的感召，可見一般了。

記得先生上課時，一進門，聲音立刻寂靜了，青年們將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陣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講義上的頁數，馬上開始講起來，滔滔如瀑布，每個問題的起源，經過，及先生個人對此的特殊意見。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語調，講不到二十分鐘，總會聽見一次轟笑，先生有時笑，有時並不笑，仍在繼續往下講，會憶有一次，在北大講「苦悶的象徵」時，書中舉了一個阿那托爾法郎斯所作的「泰倚思」的例，先生便將泰倚思的故事人物先敘述出來，然後再給以公正

的批判，而後再回到講義上舉例的原因。時間雖然長（先生授課，兩小時排在一齊繼續講兩個鐘頭，中間不下堂）些，而聽的人，却像入了魔一般。隨着先生的語句，的思想，走向另一個境界中了。要不是先生爲疏散聽者的腦筋，突然講出幽默話來。使大家轟然一笑，恐怕聽的人，會忘記了自己是在課堂上的，而先生在中國歷史人物中，特別佩服曹操，就都是在講授時候，以幽默口吻送出的。

因爲先生對青年有那樣的吸引力，所以無論是十六年在上海時，到勞動大學，大夏大學，光華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立達學園等處。或十八年及二十一年兩次到北平，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國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學等等。一聽到先生來講演，青年人像發狂似的，都擁擠到會場，後來的，就只能站在窗子外或大門口來聽了。而在北平師範大學，竟因大禮堂容不下衆多的聽衆，致將窗子都打破。備講者，不能不請魯迅先生到露天場上去作獅子吼，因那次聽衆實在太多了。魯迅先生曉得站在後面的青年，絕對聽不見，他自己只能提高嗓音吼叫了。這是先生由北平回到上海時，以幽默口氣講出的。

固然，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感召力。他的幾十冊的著作與翻譯，是一個動力。但先生講話能更吸引青年，却是更重要的動力。

一九四一，九月。

魯迅與世界語

在帝國主義尋找殖民地的當口，語言文字，也是他們利用的武器之一。第一次歐洲大戰前，德文在中國之盛行，不必講了。現在日本在我淪陷區，拚命推廣日文與日語，總是衆人週知的事實。

因為帝國主義找殖民地的目的，不祇是要推銷貨物，吸取資源，還想奴役人類，使其成爲他的巨屬，於是在除了「聖經」與「大炮」之外，文字語言，也要網佈開來。這樣，在「大炮」與「聖經」所及不到的地方，文字語言就發生很大作用了。一世紀，兩世紀，推廣下去。被奴役的人們，眼界既屬有限，思想就定型化了。除了甘心爲主子作奴隸外，很少會想到別的。這是被壓迫的民族，應該提倡柴門霍甫所創造的世界語 Esperanto 唯一的理由。

中國世界語運動的開路先鋒，是劉師甫。支持此運動最有力者，是蔡子民，蔡先生長北大時，曾特地撥出經費，聘孫國璋爲講師，在北大設立世界語講習班，爲青年學者開了不少便利。而盲詩人愛羅先珂來中國講學，亦是由蔡先生發動聘請的。

愛羅先珂是世界語學者，但他又是詩人音樂家，到北平後，就住在魯迅先生的家庭裏，——當時魯迅尚與×××同住，在公用庫八道灣的房子裏——愛羅先珂無論在什麼地方講演，翻譯者，不是魯迅，便是×××。（愛羅先珂講演，多用日語，）但因×××講話，不容易引起聽衆的興趣。很有些地方，竟指名要求請魯迅先生作翻譯。

因了先生與愛羅先珂接觸的機會特別多。而愛羅先珂當時，又喜歡用世界語寫小說。本來贊成提倡世界語的魯迅先生（孫國璋在北大講習班教世界語時，先生曾經前往聽過一次課。據先生說：孫國璋不特不懂得教授法，更不懂得世界語，講習班要他教下去，中國是沒有人會弄好世界語的，）這時節便開始了學習。可惜當時，中國世界語工具太不完全，不特沒有書籍與讀本，連講義字典都沒有。而愛羅先珂又因環境不宜，不能不離開中國去。所以魯迅先生的世界語，終於不曾學好。

民國十二年，北平世界語專門學校成立。學校教務處的陳空三與馮省三，去面請先生來教課，——講文學史或文藝理論，先生說：——

「論時間，我現在難於應允了。但你們是傳播世界語的，我應該幫忙，星期幾教，我今天還不能確定。等一兩天，我把時間支配一下，再通知你們」。

次一天，先生的通知，即送到學校去了。記得當時是，每星期五，先生去教兩點鐘。而且一如在北大的教法，兩個鐘頭連續不下堂，一直教下去。

世專校學生，當時將近兩百人，而選修先生課的，起先只有四十多個人。因在先生教課的時間，有一門數學，學習科學的人，這一門課，又不能不去上。所以先生開始在世專校教課時，是在丙組一個小教室裏，一星期，兩星期，聽課的人，越來越多。最後，學校不得不請先生到兼作禮堂用的甲組大教室去，第一學期未選先生課的人，到第二學期，都改選先生的課程了。

可是，世專校當時的經費，非常之困難，請先生教課，原沒有取講定每一點鐘多少錢。待到底，學校當局才決定：每月送車馬費二十元。但先生却不收這一批錢。他對當時送錢去的陳空三說：——

「學校經費困難，我是曉得的，所以這錢我不收，你還是帶回去。我覺得：一個世界語學者，在目前環境下，應盡自己力量貢獻到世界語。然後世界語才能傳播出去。我自己雖然現在連一個單字都寫不出來。但我是支持這個運動的，因為我贊成她」。

先生終於沒有收那每月二十元的車馬費，一直到學校停辦時為止。

先生因為贊成世界語，所以他自己不特義務地教了幾年書，他經常還鼓勵學生，努力從事實

界語作品的翻譯。爲世界語本身奠基礎。記得當時受了先生鼓勵，而動手譯出短篇作品，發表於北平京報副刊，黃報副刊等地方，就有李端甫，王秋士，李文輝，呂蘊儒等人，而陳聲樹等人，更號召了用世界語翻譯中國哲學及文學向世界傳播的大計劃。惜世專校因經費困難及風潮關係，這個大計劃沒有實現出來。以致魯迅先生的鼓勵，算白費力氣了。

一九四一，九月。

魯迅的嚴謹與認真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一個清朗的星期天，吳曙天女士，隨着她的愛人章衣萍，來訪魯迅先生了。據說：她剛由杭州的母家來。在她盤旋的短時間內，她的將近六十歲的父親，再三稱道魯迅了不起。其原因，是他的父親看過了吶喊，所以才有那樣稱贊。當時，我很懷疑吳曙天的話，想着六十歲的老頭了，會贊成新體小說吶喊，不是吳曙天想在魯迅面前賣關子，便是她的父親，也許是老留學生，所以才能對於新型吶喊有理解，可是後來聽章衣萍說，吳曙天父親，不特不是留學生，而且是在清朝得過功名的遺老。但贊成吶喊，又是的確的。因為吳老先生，還由家寫信，給他在北平的女兒，要魯迅其他著作看。這事情真有點奇怪了。

到民國十四年暑假，我到河北大名府的金灘鎮，在那裏，看到一家糧食店，常期訂閱着北平的京報。有一天，那糧食店老闆，同我談起北平各種情況時，忽然問我：魯先生現在作什麼？我問他何以注意到魯迅先生？他說：京報各種附刊及副刊上，魯先生的文章，他是篇篇都看的。覺得魯迅先生講話，最懂人情，最有道理，可是，以我所記得：魯迅先生在京報副刊及各種附刊（

當時京報除每日有由孫伏園主編之副刊外，還有七種週刊，每週各出一次，如莽原，文學，民衆文藝，婦女，科學，園坵，戲劇等。所寫的東西，除一小部分散文詩外，大半是雜感式的短評。不料這些短評，竟爲一個糧食店老闆看中了。那位老板以他的白鬚與白鬍看來，其年歲，總在七十左右了。

還有一件，是張十方先生告訴我的。據說：他有一個世伯莫某，民元前是作革命工作的。以後不願做官，便在香港作寓公，並兼營生意，其生活，是相當闊綽的。但奇怪的，是他頂佩服魯迅。因爲魯迅的各種創作，他都收集起來看，年歲自然是五六十以上的了。因爲在三十年以前，他就作着革命工作了。

由以上三件例子，使我想到；對於魯迅先生的敬仰，並不祇是一些研究文藝的青年。也不祇一般中大學的學生。魯迅先生以他的極敏感的思想，最深刻的觀察才有那增一字嫌多，減一字嫌少，磨煉得恰到好處的筆法，向虛僞進攻，向卑污打擊。而更對後一代人，指示出路與方法。所以稍微用點思考的，或對社會有若干認識的，便對魯迅先生的文章，起了共鳴了。其實，不祇是共鳴，有些人還認爲魯迅先生的思想與方法，是中華民國復興唯一的路線呢。會憶：已故山東蔡壽潛先生，在民國二十年前後，就將魯迅的警句，一條一則的抄錄起來，貼滿了他的房壁，以

座右銘呢。

但這些，都是先生在苦難中，用盡了一切精力，才會有那樣出人頭地的功績，絕不是一般空頭文學家所想的那樣簡單，一首打油詩，兩段雜感，半篇小說，幾句批評，馬上就可以霸坐文壇，嚇到一切。試舉魯迅先生之認真，就可看出一般了。

民國十三年冬，鄭振鐸主編的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小說月報某期上，誤將蘇聯人民教育委員長盧那卡爾斯基像，排成另外一個文學家名字了。當時，我將所買的一本小說月報，拿到魯迅先生家裏去，請他再查對一下看，究竟是不是錯，魯迅先生一看，說……

「他們真胡鬧，連照像也可以隨便安排」。

先生馬上跑到書房裏（先生住北屋，書放南屋。）不特檢出盧那卡爾斯基像。連錯的那個人（名字我現在記不起了）的像，也查出來了。我當時說了一句：那麼；代他更正吧。先生緊接着說……

「由你發現，就由你更正吧，證據我這裏有的是」。

結果：我就在伏園主編的京報上，指出那個錯誤來。

因為先生曾說，小說月報自命為文學領導者，也時常板起面孔，教訓青年，不應該有那樣錯

誤，教青年人跟着牠去錯。所以雖是一個像片的小錯，先生也是主張糾正的。

再有：就是中國印毛邊書，是先生所主張，而且開創的。因為先生看到，中國新裝訂的書，因看書人手不清潔，而看書，又非常之遲緩，一本還沒有看完，其中間手揭的地方，總是隔得烏黑，因為那地方，沾的油汗太多了，等到看完了要收藏起來了，一遇天潮，書便生霉，再長久，就生虫。所以先生主張將書裝訂成毛邊，待看完以後，將沾油汗的毛邊截去，書便很整齊擺在案上了，既新鮮，又不生霉。但看毛邊書，却非常之麻煩，第一先用刀子割，不割是不能看。第二看完又得切邊。不切邊放不整齊，因此，一般買書的人，多不高興要毛邊，以此，先生第一次在北新書局印毛邊書，就再三告訴北新老闆李小峯，一律裝成毛邊，一本都不許切邊，但等印成，李小峯將一二十本送給先生，預備供給先生贈人時，書却都是切好的了。先生當時火起來了，問李小峯，究竟怎麼一回事？李小峯是這樣答覆的……

「一開始裝訂，我就將毛邊的擺出去賣，但沒有人買，要教我切了邊才肯要，我看沒辦法，所以索興都切了邊」。

魯迅先生馬上說……

「那我不要切邊的，非毛邊的不行，你能將就買客，當然也可以將就我。切邊的我決定不要

，你帶去好了」。

李小峯只得將裁邊的光本帶回去，再為先生送毛邊的去，此後為先生送的，雖然都是毛邊，但寄到外埠分店的，還是切邊本，在北平，恐怕先生看見不答應，便將毛邊本送上街坊上了，待以後，毛邊本成了時髦品，那只能又作別論了。

另外，還可舉出相類的例了。

魯迅先生很贊賞已故畫家陶元慶的畫，所以，在元慶開展覽會時，先生不特代他作序言，在陶元慶住在北平的當時，先生所出的幾本集子，如吶喊，彷徨，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等，都是陶元慶代作封面的。陶元慶亡故後，先生在上海遇見孫福熙，要福熙為野草作了封面。用雖然用了。但先生不喜歡那樣多的灰色。此後，大部分集子的封面，全出自先生手筆，有時，勾些古物，有時寫幾個簡單字，也有用顏色配合一下，然後再題上字的。總之：先生沒有再接觸到可憐的畫家，所以不找人畫封面了。

由以上種種，我們可以看出先生的認真，堅持，謹嚴，換了話說：就是先生有毅力，有韌性，絲毫不含忽也。

雖然，所舉的都是些小事，先生却在這些小事上，建立起偉大的基礎。

九月・最後一日。

魯迅論愛羅先珂

魯迅先生翻譯的「桃色的雲」底作者，愛羅先珂，到現在恐怕很少有人記得吧？

愛羅先珂是詩人，是音樂家，同時又是世界語傳播者。但他却是一個瞎子，而且在四歲時就瞎了。

他是和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又因為是盲人，所以他的幻想中的「烏托邦」，特別來得明顯。

他奔波於歐亞兩大洲，但到處都聽見殘酷的叫喊，到處都遇到冷的空氣。所以他的詩篇，總帶着感傷的調子，而盲，又限制了他的行動，所以他終於抱着悲哀的心情，默默地過去了。——雖然他想藉世界語的傳播，以便助成他的「烏托邦」的實現。

他曾來過中國，而且有兩次。同時，他不像蕭伯納似的，香港、上海，終於坐着飛機，在北方的天空裏兜了一個圈子走掉了。——那是觀察家，也不像太戈爾似的，要中國人再發揚精神文明。——那是捧場家，他在北平居留了相當期間。他作詩，他講演，他教授世界語，他更出席著

樂演奏會，不祇是歌唱，還拿出絃琴，彈那優靜而略帶感傷的調子，他是要激發起中國人的覺醒，雖然假如覺醒之後，應該怎樣？愛羅先珂在他的詩篇或歌唱裏，並未有明確的概念。但這一點，在現實意義上講：已經足够了，因為當時的中國，還在雙重的羈絆下，覺醒還是急切地需要啊！

我到世界語專門學校讀書時，愛羅先珂已離北平而去了。雖然世專的創立，與愛羅先珂復有關係，但他却不及見那新興的學校成立。因此，對於愛羅先珂，竟沒有見面的機緣，所知道的，不過是從學校當局者口裏，曉得他是世界語傳播者，而且是很熱心的一個。

俟後，曉得：愛羅先珂兩次到中國，都是住在魯迅先生家裏，這才有機會聽到——愛羅先珂的事故。

魯迅先生說：——

「愛羅先珂因為是詩人，所以他特別敏感，記得他第二次到中國來時，北京大學請他來教書。據愛羅先珂講：中國人與日本人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不同處，是日本人對於事理的呆板與冷酷。而中國人却洋溢着很厚的人情味。其證據是：當他——愛羅先珂——在日本登岸時，遭受了日本官廳的拒絕。因此，日本警察對愛羅先珂不特搜索了他的身體與行囊，還給予他嚴厲的侮辱，

他在中國雖也遭警察的檢查，但警察却對他一點沒有橫暴的行爲。而警察自己，還在一旁咕嚕着：他是瞎子呀，我們也太那個了。因此，愛羅先珂斷定：中國人只要覺醒起來，很容易得到助力，因爲中國人能以同情給人。至日本，那只有到處碰釘子了。因爲日本人眼中，已沒有別的人類存在了。這是愛羅先珂思想上的敏感。愛羅先珂又因爲是盲人，他的身體上的感覺，也特別發達得厲害。天要雨了，天要晴了，他是常常預先知道，要是有人找過他一次，第二次如再去找他，而論換個什麼地方，或換個什麼時候，他一聽脚步聲，就曉得是某人來了，不必等那人講話或報名出來，甚至有時他聽生人的脚步聲音，也能斷定：來者是怎樣性格的人。」

魯迅先生對愛羅先珂的描模，很能使人理想一會那個預言者。可是，魯迅先生又說到他的：

「愛羅先珂非常之害怕女人。有一次，女師大請他去講演，在講演完畢之後，學校還預備了些點心。有教職員，有學生，都圍來問愛羅先珂這樣那樣的問題。有些人，則一味勸他吃茶點。愛羅先珂當時坐的筆直，臉面非常之嚴肅，點心固不吃，連茶亦不肯喝，後來離開學校，回到家裏，我問他：「今天那裏預備的點心，都是你平素非常之喜歡吃的，爲什麼今天一樣都不動手呢？」他竟說：「那裏不是有女人麼？」你看，他在女人面前，連吃都不敢了。」

「在他自己太太面前也這樣麼？」我很奇怪地問：

「他還是獨身啊？」魯迅先生說過，好像想起了什麼事似的，過了一會，又繼續說：「聽說他在日本時候，愛過一個寡婦，一天到晚，向那女人送詩篇，但見了那女人，却什麼話也不敢說。結果：當然失敗了。從此，他就更怕女人，恐怕他還是童男子也說不定。」

這，使我恍然於他的感傷的調子的由來，魯迅先生又說：——

「他每每來中國，住過幾個月之後，便喊：『寂寞呀，寂寞呀，好似住在沙漠裏似得，這回非回去不可了？』可是，他離開中國，不是到歐洲各國去流蕩，便是又到日本住下了，終於沒有回到俄國去。」

愛羅先珂雖有普通一般詩人的敏感，但他的心靈却是脆弱的。所以他受不起俄國的大風暴，沒有正視革命的力量，只能到處流蕩着，到民國十五年，我忘記了月日，總之有一天，魯迅先生忽然告訴我：——

「愛羅先珂回到俄國去了，」

「怎麼，來信了麼？」

「已經死掉了。」

「你怎麼知道呢？」

魯迅先生答：——

「一個日本朋友來信，說他在日本瞪了一些時候，又是寂寞呀，寂寞呀天天喊，最後終於下了決心，回到俄國去了，可是，他不贊成共產黨的作法，於是不明不白的死掉了。」

「他大約反對共產黨吧？」

「我想是的——他主張用和平建立新世界，却不料俄國還有反動勢力在與共產黨鬥爭，共產黨當然要用武力消滅敵人，他怎麼會贊成呢？結果：他就被作為敵人而悄悄消滅了。」

事實是：愛羅先珂也難於長久活下去，以他那樣的敏感和脆弱的心靈，只宜於坐在象牙塔裏作預言的喇叭。一與現實接觸，他的象牙之塔就非崩潰不可，那怕現實就是預言的兌現，他也難於承認了。——除非他於敏感之外，還有一付正視革命的力量

一九四一，十二月，歌樂山。

有趣的會談

民國十三年冬天，北平世界語專門學校，從哈爾濱請來一位俄國教授，名謝利謝夫，這人好像白俄，思想糊塗得很。但他的世界語，却是透熟，無論講話，寫文，都很沈利。

他到北平後不久，也慢慢探聽中國的作家。當時別人賞鑰他腦子最深的，是魯迅。因此，他時時想會見魯迅。

這意思，他通知了學校教務處陳空三先生，陳空三就同我商議，要我帶謝利謝夫去會見魯迅。

有一天，我同魯迅先生談起，魯迅先生說：——

「好的，不過不一定請他到家裏來，隨便在什麼地方談談都可以。」

這意思，是不願意我帶那俄國人登門拜訪。我當時就說：——

「那麼；到東安市場去，我請你和謝利謝夫吃晚飯。」

「今天麼」？魯迅先生考慮他自己的時間。

「就今天罷，你從家裏直接去，我到學校去約他。誰先到誰等着。」我便拿起大衣，帽子，預備先動身，恰巧，孫伏園章衣萍來訪魯迅先生了。此時，魯迅先生手裏也拿起圍巾。先進來的衣萍說：——

「怎麼？你們出去麼？」

魯迅先生笑了，又放下圍巾，他說：——

「有麟要請客，難得的機會，一塊兒去東安市場罷。」

伏園「啊」了一聲，又幽默起來：——

「要作陪客：也未嘗不可以。我們倆是預備找地方吃飯呢。」

說的大家都笑了，我便要他們三位一塊兒走，我跑回學校去約謝利謝夫。

謝利謝夫意外了，他認定：要拜訪一位名人，最好先期約定。然後再照了時間去赴約，比較客氣些。我曉得；他的白俄脾氣又發了。便告訴他：這就是同魯迅先生約好的時間，所以要馬上就去，在他明白了馬上非去不可之後，便手忙腳亂起來。要洗臉，要擦皮鞋，要換衣服，要給頭上打油。然而，無論怎麼弄，總是不滿意。是我催的次數太多了，他才隨我走下樓，早已僱好的馬車，將我們一直送到目的地。

魯迅，伏園，衣萍，早已坐好在約定的飯館裏，我進門後，將謝利謝夫一一介紹過。即刻聲明：我的世界語還沒學好，不能任翻譯。但當場又沒有人懂得俄語，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於是謝利謝夫吃驚了。

「是客氣？還是真的？我們誰也不懂俄文。」眼睛一直瞪着我。

「我只能聽得懂，我却講不出。」

伏園笑起來了，問我謝利謝夫能不能講英文，如果能講英文，就要衣萍作翻譯，章衣萍雖羞怯着紅臉的頭，但我還是問謝利謝夫能不能講英文。

幸而，謝利謝夫也不懂得英文。

他說：他能講德國話，日文也能對付，我才高興了。因為我曉得：魯迅先生能講日本話，日文也可以對付，於是將這意思向魯迅先生與謝利謝夫說穿，要他們直接去談話。

魯迅與謝利謝夫開始談話了。謝利謝夫開口的是德語，他以為魯迅能懂德國話。魯迅講出的，却是日語，他以為謝利謝夫能懂日本話，兩人都選取了自己的熟悉語言而應用。無法顧到對方對另一種語言，聽覺的能力，這會談，是乾乾脆脆失敗了。謝利謝夫噘着嘴，摸起他的長鬍子。魯迅先生皺起眉頭，拼命在抽煙。本來說不好世界語的我，不能不用世界語再維持場面。

吃飯間，謝利謝夫再不問魯迅先生對於俄國革命的意見，對於雷昂托爾斯太的意見，他一心一意地選取着他最可口的菜，只顧吃。魯迅先生也不再講日語了，他應了伏園指斥侍者將手指甲放進湯盤裏的事，講起衛生論來，他說：——

「在中國飯館吃東西，你無法講求清潔的。除非不要吃。我有一次，也是在東安市場吃飯，好像是與馬先生罷，發現菜盤裏一個蒼蠅，便把茶房喊來，問他：「那是什麼東西？怎麼可以給人吃？」不料茶房將蒼蠅用手指夾起，在他自己眼前一晃，一下放進嘴裏去，還說：「不是蒼蠅，不是蒼蠅，」笑嘻嘻走出去了。你說，你嫌不衛生，他先吃蒼蠅給你看，你說，菜裏不應當有蒼蠅，他說沒有。反正蒼蠅已經吃進他肚裏，你再找不出證據。……」

說得我們全笑了，謝利謝夫放下筷子，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略將大意告訴了他，也不知道是我辭不達意，還是他聽誤會了。竟將放下的筷子，再不拿起來。魯迅先生曉得：我的傳語出了毛病，要我再告訴他，菜裏有蒼蠅，同茶房吃蒼蠅，都是過去的笑話。並不是現在的事情。請他安心吃下去。可是，無效。雖經我解釋，謝利謝夫再不動筷子了。

飯後，我們就在原地方，吃茶，談天，伏園又從隔屋裏拉來當時正在北大讀書的王捷三。談話更加熱鬧了。忽然謝利謝夫悄悄告訴我他要出去，出去作什麼？有一專名詞，我聽不懂。

我要他對魯迅講，他使用德語對魯迅說。然而魯迅聽不懂，用日語反問他，謝利謝夫又答覆不出日語來。

最後，他臉紅了，長鬍子一束一束抖動着，他索興擱着腰，擡起屁股，兩隻手在屁股上作了一個姿勢，大家恍然了，立刻喊茶房，帶他出去「大便」。

他一出去，房內立刻爆發出哄笑。魯迅先生怨我了。

「你真搗亂，自己世界語弄不好，就亂作翻譯，鬧得大家受窘」。
我立刻反駁：

「我一進來，就聲明：我不能翻譯呀。」

「那你弄一個語言不通的外國人來，什麼意思呢？」魯迅先生嚴肅起來。

「他要認識你，你也承允，所以就帶他來了。我只負介紹責任」。

「介紹能不講話麼？你真搗亂得可以。請好好罰一下。」

伏園衣萍也贊成魯迅先生的提議。主張罰我一下，我說：——

「好，下次再請你們吃飯，另外帶一個朵落貝夫來。」因為我想起：世界語專門學校，又向哈爾濱請了一位教世界語的俄國人，不過當時還未到北平。

魯迅先生笑了，大家都笑了。魯迅先生還附加着說：——

「還要再搗亂一次麼？」

笑聲中，謝利謝夫又進來了。大家再沒談下去的意思。於是一齊離開了東安市場。

事後，魯迅先生告訴我——謝利謝夫是什麼也不懂得的。思想恐怕還有點「可惡」。我於是才開始向陳空三等人，打聽謝利謝夫的來源。據說：他是俄國革命後，逃出來的白俄，還是俄國的舊教授。當時介紹他來學校教書的人，信上還寫着：——

「爲了世界語的傳播，就介紹他來吧。他的世界語甚相當流利的。不過不要讓他担任其他功課。他的思想與行動，可不很高明。」

果然，不到半年工夫，他就厭煩了他的工作，辭別了學校，另作黃金夢去了。魯迅先生觀察的深刻，竟有如此之敏銳。——雖然他與謝利謝夫只講過那麼幾句不很能互相明瞭的話。

一九四一，十二月，顧家橋。

魯迅先生的生活和工

常常有些論客，一開口，就是魯迅如何偉大，如何了不起。接着是：將那馳名世界文壇的洋作家，拿來亂比一陣，不特使外國研究魯迅者，不知所措，就是連中國的愛好文藝青年，也眼花撩亂起來。因為所有好的形容詞，都加在魯迅身上了，而魯迅的思想，的行動，以及一切的態度與生活，反而沒有人問了。這不特是魯迅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壇的悲劇。現在為補救這個缺陷，僅就個人記憶所及，將魯迅的生活及其工作的情形，略談一下。

魯迅自五四運動後，在中國文壇的活動，才漸漸積極起來。他感覺到：中國政治的黑暗，人民大眾的愚昧無知，封建傳統之根深蒂固，他準備他在日本求學時早已憧憬着的診醫計劃，於是他便在「新青年」上發表出好似匕首的鋒利的短評，向四面八方噴出去。但這時節，他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研究中國的古籍，據魯迅先生講：他當時感覺到：無名的痛恨與悲哀，眼前的環境，是那樣的黑暗與淒慘，而中國的士大夫階級，卻還迷醉於死骨骸堆中，大提倡其中學為體的謬論。於是便決定：要從古籍堆中找出癥結與矛盾，但這步工作，却是頂煩雜的繙錢又費時，所以他

於研究古籍之餘，開始寫小說了，剛好那時節，北京晨報發行了以學術討論及文藝研究為中心的副刊，編者是先生的學生孫伏園。筆名的巴人，便以小說作者，在晨報副刊上與世人相見了。據先生講：當時所謂稿費還少得可憐，作者與編者，也並不把那批錢計劃在預算之內。

寫文章雖然很少稿費，但在當時生活程度比現在低得嚇人的北京，十個八個當十銅元，即能吃飽一頓飯，而兩菜一湯的頗為豐美的包飯，才出兩三元錢一月。魯迅先生的生活，在那時，實在算是優裕的。因為他在教育部作着荐任職的僉事，（現行官制並無僉事，其階級與現時各部會科長同。）每月有三百元的收入，其生活，自然是優裕了。所以他能購買現在北平西直門內八道灣的房屋。俟後，他又担任了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及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師，收入當然更多了。不過，這時的收入，卻成名錢了。因為雖然在學校方面，因教課而增加了收入。但教育因不為軍閥政府所注意，漸漸扣發經費，鬧得：教育部職員薪俸，也開始打起折扣，而且不能按月發，所以到魯迅與周作人翻了臉，而不能再在一塊同住時，魯迅一面在磚塔衙衙租屋暫住，一面就進行買那阜城門內西三條胡同的房屋，可是，這時節，他的經濟，並不比以前充足了，雖然每月收入，供給全家人生活，還是有餘，但他一天到晚，只要有空，總喜歡跑到玻璃廠去搜羅古籍，或者跑到北京飯店買洋書，這樣，手中有錢，就不會很多了。他西三條新房交價時，他還借了

一千多元的價，這是先生常常談起的。

從買了新居之後，先生的經濟，再沒有特別充裕過，教育部的薪俸，越欠越不像樣了。有時，本年九十月，才領去年四五月份的薪，而且祇發兩三成。先生的生活負擔，並未減輕，買書嗜好依然。又因爲「吶喊」出了版，使先生在青年界，引起了廣大羣訪問者，烟哩，茶哩，點心咯，酒飯咯，也得時時招待，這時節，雖然稿費有了，版費也有了。但先生的稿費收入，却抵不過在文化方面的銷耗。如語絲的創刊，先生就會經拿出一部分錢，成舍我要籌辦什麼書店了，先生拿出一部分錢，在金錢方面，使先生犧牲最多的，是北新書局的創設，因先生及其友人，感覺到：完全用北大新潮社名義，印行書籍與雜誌，很有不便的地方。於是原是新潮社事務負責人：李小峯及章川島，便勸誘魯迅先生等人，另行設立北新書局，先生在幫助北新的成立及發展，除經濟之外，精神犧牲，亦是很大的。

後來，北新書局漸漸發展起來，生意也特別興隆。先生在初創時，拿出去的錢，不特未收回一文。而北新與先生的稿費方法，亦特別得使人吃驚。民國十三四年在北平時，李小峯偶而從旁人口中，如章衣萍，許欽文等處，知道先生有所需錢時，就隨便拿幾十元或一二百元送去。待後，先生因應林語堂之約，由北京而廈門，在廈門大學以與學校當局意見相左，又應朱家驊之約，

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終於因學生被捕事，先生營救無效，憤而辭職走上海。到上海後，先生因無固定收入，乃與北新老閻李小峯打交涉，結果：決定除先生在北平之家，由北平北新書局，仍按月送五十元外，上海方面，由北新每月暫送二百元。但以先生在上海生活，二百元似不够用度，已故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子民先生，當時正長大學院，聞先生在上海謝絕一切教書生活，專心致力於文藝事業，深恐先生入不敷出，乃以大學院名義，聘先生為特約編輯，月致生活費三百元，先生乃能安心在上海從事文藝工作。但北新書局對先生之版費，仍未增加。曾憶民國十八年在上海時，先生曾言：北新書局欠他版費，已有十八萬餘元，可惜此款，多為北新老閻李小峯之兄，拿去嫖女人，討饒太太去了。否則，倒可以作一小小資本家，作一點有益事業云云。真可惜，直至瞑目時，北新此批欠款，仍未能付給先生，不然，先生能以餘款，易地療養。或者還會對中國文壇上，多留些遺產罷？我想。

統觀先生經濟收入概況，以中國人生活情形來說，固然不能說，已貧困到無米下鍋的地步，但却絕對不能算是富裕。因先生除北平一座房產。僅僅供自己居住，並不收租金外，一家四五十人生活，全靠先生工作收入來維持。而工作收入大半又為書店老闆故意所拖欠，鬧得先生在最後十多年生活，絕無一文餘款去儲蓄，一遇有特殊事件發生，就得向友人借貸，先生又是過於刻苦

的人，衣裳多半是留日時代及民國初年所作的舊衣裳。縫而又補，補而又縫。記得先生在上海時，穿的一條灰綠色呢西裝褲，在北平時，已破爛。而十年後在上海的先生，還是縫補着再穿。那條褲子的來源，却是民元前，先生在日本作學生時製作。因此，褲角之窄狹，可與衣袖比美了。可是先生對於旁人要求借貸，却從來很少拒絕。一般青年，因政治關係，要求幫助路費，要求救濟生活，先生總是盡了力之所能及，盡量接濟，可惜這些人名同金錢數目，因先生向來不記那批賬，都無法提出了。但在上海辦刊物的，創設小書店的，得到先生接濟的，總還記得罷？而廣東青年男女數人，一直住在先生家裏，為先生所養育，這更是盡人周知的事情。

以此種種原由，先生的生活，總是在免強維持中。會憶有一個時期，未名社諸友，曉得先生清苦時，曾決定將開明書店所欠未名社版費八千餘元，一律撥奉給先生，先生雖未從開明書店拿到那整批款子，但由這些地方，亦可看出：先生的生活情形了。

以上是魯迅生活的一面。

現在再談魯迅的工作罷。

先生的工作，可用四個字來包括，即：勤苦忠誠。先生專心致力於文藝，前後共有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爲了生活關係，要上機關辦公，要到學校教課，有時又爲政治環境所限，像民國

十五年張作霖入關，還得躲避麻煩。殆可以說：先生能安心工作的時間，實在很少。但就是此很少的時間，先生也盡量利用了。除編輯刊物，代青年作者修改稿件，爲同路人籌劃出版物等零星事件，無法計算外，先生的全集，就是有力的證據。而先生大部分工作的完成，又是在一天精力疲勞後的夜間。曾記民國十五年前在北平，大抵是上半年教課，下半年赴辦公室。或者是上半年赴辦公室，下半年授課。以後在廈大，在中山大，先生雖僅只在學校，但無論廈大與中山大，先生除教課之外，都另負有事務上職務，而先生又是一絲不苟的人，對於所負責任，向不馬虎，只要是他承認所擔任的職務，沒有不想辦好的。因此，在這一段落，先生白天還是很少有時間，專弄文藝工作。待十七年到上海後，先生才決心辭謝了一切大學校的聘書。可是，此時中國文壇之活躍，比以前熱鬧得多多。——尤其是政治中心由北平移到南京，而上海又有租界的特殊環境。可以說：中國文壇的重心是在上海。在先生到上海不久，訪問者便紛至沓來。大本長篇小說，繁重的多幕劇，甚至一篇散文，一首小詩，都由紅臉的青年手裏，或者綠衣使者布袋裏，遞到先生手裏，先生對於街坊上出版之雜誌刊物，有時很忽略，無論在北京，在上海，以及廈門與廣州，很少到街坊書店收買雜誌刊物。除了是雜誌刊物社所贈閱，文壇上如有重要或特殊的論文與作品，多半是由先生熟識的幾個朋友與學生，特地買來送先生。當然，有時也有與先生正在作論戰，

或本來反對先生的敵人，特地將攻擊先生的文章，寄給先生，希望使先生發氣或者希望先生答辯。但遇了這種場合，據先生講：他是很少上當的。本來要在旁處看見，他或者會答覆，可是敵人希望他答覆時，他却偏不答覆了。爲的是：不願意中敵人的陰謀。會憶二十年，上海某小報，造謠說：魯迅近來常常支持某黨言論，是因魯迅每月得到五百金盧布所致。編者再裝好人，將上述一期的報寄給先生，並寫信要求先生答辯。先生看後說：「他們又來搗鬼了。我偏不理」。

但這，並不是說：先生對於文壇上事，完全不關心，十三年歐陽蘭在北平「文學週刊」上，大罵青年人作品之幼稚。教訓青年們還是少發表作品爲是。先生一看到，當天晚上，就寫了答辯。說青年作家永不發表作品，從那裏來的進步？不是永遠埋沒要黑暗下去麼？

因爲先生對於文壇的動向極關心，所以對於自己所担任的工作，便格外謹慎了。據先生自己講：「野草」中的「過客」一篇，在他腦筋中醞釀了將近十年。但因想不出合適的表現形式，所以總是遷延着，結果雖然寫出了，但先生對於那樣的表現手法，還沒有感覺到十分滿意，這可以看出：先生對於工作的忠實認真。

還有一件，是先生預備翻譯「小約翰」時，發現日文譯本不忠實，而德文本的「小約翰」，又有刪節的地方。但先生除此兩種文字外，又不能運用其他文字，有一天，在教育部談起，先生

的同事齊中頤說：他看過英文本的「小約翰」，而且很好。於是先生就同他商議，要他用英文本幫忙，當時齊中頤正被教育部派在北平中央公園整理檔案。先生便與齊君約定，每日下午至中央公園，先生參閱日德兩文本，齊君解釋英文本，兩人逐字逐句校譯，記得當時是炎熱的七八月，先生穿着很舊的而且小得緊身的淡藍竹布大褂，一手夾着書，一手拿着香烟，總向中央公園跑，有時去的太早了，或者精神疲倦了，還到公園柏林下面轉轉圈。自然有時遇到熟人，還在露天茶社裏，坐上個把鐘頭。總之：先生對他自己所執行的工作，是一絲也不肯苟且的。比如：在先生譯的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出版後，商務印書館，也有了同樣譯本出版。先生便立刻買來，又與自己譯的逐一對比較，結果：發現旁人所譯的，對於文法的處理及語句的運用，有些地方很難表現原作者的意思，先生才安心於自己的譯品。

先生不特對自己的工作，如此重視，即對他人的工作，亦同樣重視的，——尤其對於青年人的譯作，如有找他修正或介紹的，先生總是很認真的代閱校，很誠懇的代推荐。記得當時在中國大學求學的回培良，寫了一篇戲劇，送給先生看。先生看過認為很滿意，便來告訴培良，立刻用掛號寄給當時在上海出版的東方雜誌的編者，還寫了正式的推荐信。指明培良戲劇的優點之所在，培良那篇東西，自然很快地發表了，與此相同的，還有一件，是已故胡也頻（在北平時原名胡

崇軒)跑到烟台去訪友。在那裏，他寫了一篇同性愛的小說，寄到魯迅先生處。先生看後，認爲很滿意。當天出門時，就把稿子帶給李小峯，要他發表在當禮拜出版的語絲上。因爲先生說：旁人用心血製作的東西，我要不用心血去保護，總覺得不安。

因爲先生用心血保護青年作家及其作品，所以就有這樣事情發生過：

「莽原」初附於京報發刊時，有名姜華者，(四川人，當時好像在中國大學讀書)投來一篇稿子，先生看過，認姜華很有希望，便寫信要他常常寫。俟後姜華便常常來稿了，所以「莽原週刊」上，隔一兩星期，總有姜華的作品。但後來，不知是中國大學什麼人，對先生說：姜華是國家主義派，在學校很得同學們反感，「莽原」不應該常登他的文章。先生馬上生氣了，說：

「一個刊物，是選登作品，怎麼能調查人家的行爲呢？」

而且特別約姜華，要他多寫文章來。

再，先生關於與人論戰的文章，特別改而又改，往往此類雜感或論文式稿件，總是改的一塌糊塗，(但還不至於使編者看不清)決不像所寫的小說或散文的原稿清楚。在先生認爲：此種文章發表出去，凡可能反響，他都一概計劃在內，對方怎麼來，他怎麼應付，都想得週週到到，先生許多雜感中的話語，到今日能被一般人認爲格言，到處編：魯迅語錄者，就是先生在那些話語

上邊，用了過多的思考與心血所致。

以上是僅就個人記憶所及，拉雜寫來，目的，不過是爲供給研究先生者之參考。文字的整飾與否，不暇計及了。

魯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

魯迅先生筆下，無論是論文，是雜感，或者散文與小說。很少寫到戀愛同溫暖的家庭。在「野草」上雖有「我的失戀」，在「彷徨」上雖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戀」與「家」，是充滿了怎樣失望與狼狽的氣氛，便不難想像魯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

魯迅先生生長在清朝末年，——即光緒初葉。當時中國的舊式婚姻，還沒有很大的動盪，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那略帶買賣式的娶嫁，依然主宰着男女的終身命運。魯迅先生的家產如不中落，那早婚的中國習俗，恐怕在魯迅先生十幾歲時，就與他配起夫人來了，但魯迅先生家產因祖父介孚老先生下獄，而竟中落了。他的結婚，不能不拖延下去，十八歲時，他跑到南京，投考了當時所謂洋學堂——江南水師學校，二十二歲又遠去維新後的日本，魯迅先生雖然在日本沒有鬧過戀愛，但他對於中國的舊式婚姻，已起了反感。所以在一九〇六年，他二十六歲時，暑假由日本回國省親，他的母親，以女家催之不已為理由，逼住魯迅與山陰朱姓女結婚了。在這婚時，魯迅雖沒有與他的母親，怎樣大鬧以反抗那不合理的婚姻，但據魯迅先生說：他那時，實

不願意傷了老人家的心，決定自己犧牲，暫受家庭的擺佈。但魯迅先生却也不是完全沒有反抗表示，在結婚後四日，魯迅先生就以不能在家耽誤學業爲理由，又離家東渡日本了。

婚後，幾天就離開。一去又是三年。卽照胡適之博士的說法：「中國人是先結婚後戀愛」。魯迅先生此種婚姻，恐怕也無法戀愛起來罷？

回國後，先生仍是終年在外，一兩年中，難得在家證幾天。據先生太太朱女士在北平時，對內人講：「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先生的婚姻生活，可見一般了。

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歲時，因在北平買了西直門公用庫八道灣的房屋，始將家眷接京。但在北平所表現的，却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間房，因家庭人口多，（當時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塊）先生算比較活躍些。殆後，周建人赴滬，先生又與周作人分居。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

家庭是三個主人，一個老太太，魯迅夫妻二人，兩個女用人，一個王媽，一個胡媽。除老太太年紀更大外，其餘都是三四十歲的人，（曾記他家王媽年紀稍輕，但已在三十歲以外。）因爲沒有青年同小孩，家庭便顯出寂靜來。老太太保守着舊式家規，每天只看書，魯迅太太依照着舊

式家規，除每早每晚向老太太請安外，還得下廚房，因為兩個女用人，玉媽是專門服侍老太太的。胡媽除買菜，煮飯，打掃之外，關於燒菜的事兒，總是魯迅太太自己動手。這裏，我更想起：他們家裏一個特殊規矩了。就是兩個老媽子，除拿工錢，吃白飯之外，是不許吃菜的。每天由魯迅太太發給老媽每人四百錢——即四個銅板，老媽自己另外買菜吃。這在普通家庭，是很少看見的。

魯迅先生當時，除任教育部僉事外，還担任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及女子高等師範等校講師。倘若上課鐘點是在上午，那麼，下午總要到教育部轉一轉。如果上課時間是在下午，那麼，上半天也許到教育部轉一轉，因此，他的家庭，更加寂靜。而魯迅常年四季，除例話外，又不大與太太談天。據他家老媽講：「大先生與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話，早晨太太喊先生起來，先生答應一聲「哼」，太太喊先生吃飯，先生又是一聲「哼」，晚上先生睡覺遲，太太睡覺早，太太總要問：門關不關？這時節，先生才有一句簡單話：「關」，或者「不關」，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錢。先生才會講着較多的話。如「要多少」？或者再順便問一下，「什麼東西添買不添買」？但這種較長的話，一月之中，不過一兩次」。當然，這是指魯迅夫妻而言。另外，魯迅與老太太談天，比較話長些，但也多半是關於老太太看書問題。一談到家庭事務，母子倆意見就相左。魯迅

便往往不開口了。因為據魯迅先生自己講：

「在改良家庭方面，我是失敗者。常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稍微改變一點，一遇有什麼意外或者不如意的事。她們馬上抱怨了。抱怨之後，覺得還是她們老法子好。一下又恢復原狀了。」

因此，魯迅先生不願傷老年母親的心，對於家事。便不想過問了，本來就是舊式的先生的太太，又一直守着老規矩，事事秉承老太太的意旨。魯迅對於家庭，格外悲苦了。

因為魯迅先生對於家庭——其實是對整個舊社會——的悲苦。在先生思想上，增加了不少的悽愴成分，先生對於自己的太太，認定只是一種負擔義務，毫無戀愛成分在裏邊。無論是在先生談話裏，文章裏，都很難看到或聽到：先生提到他太太的事情。我記得：在北平時代，先生談話而講到：云。多年中，也僅僅一兩次。而文章中，除了「連累賤內都改了國籍」對旁人辯的話外，再沒有關於他太太的事情。下面一件事，就證明先生夫妻間的關係了。

民國十四年夏天，先生的太太忽然生病了。當時住的是與先生有交往日本人山本開的醫院。有一天上午，我與內人去看他太太的病。到了不一會兒，先生也來了。一進門，就問：「檢驗過了沒有？」他太太說：「檢驗過了」，先生就往外走，嘴裏還說着：「我問問醫生去」。過一刻，先生回來了。一進門就對我們說：「走罷，到我家裏吃中飯去」。我們也就起身向他太太告辭

。爲留空，讓他們夫妻倆人談幾句。我與內人便先走出了病房。他太太果然在問了：——

「醫生怎麼說？」

魯迅先生卻簡切地答：——

「沒有什麼，多養幾天就好了。」

說完，就匆匆跟我們走出來。這地方，也可以看出兩人間的關係了。因此，終魯迅一生，他的太太是沒有生產過。他的所謂家庭，也誠如他家老媽所說，每天是少有聲音的，——除過來客時候的例外。

因爲魯迅先生有這樣環境的家庭，那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了。到民國十四年，女子師範大學鬧起風潮，先生因同情於學生方面，這時節，學生許廣平，陸晶清，張靜淑等，才時常來先生家中。

在寂寞的家中，先生當時很需要熱鬧，雖然這熱鬧，很就誤他的工作，但先生誠懇地歡迎來客了。這當時，又因爲「吶喊」風行，北平文學團體蜂起，先生又時時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雜感，散文，小說，訪客也特別多。先生也時而說笑話，時而講理論，請來客吃點心——留來客吃飯。豪爽的許廣平，也與先生相譏罵，相打鬧，這要種下了他們倆人戀愛的根。至於他們互相戀中的

表現，這已有「兩地書」爲證，不在這裏多寫了。祇記得：十五年先生離北平時，許廣平是與先生同車走的。後來在上海同先生談起離北平的事故，先生曾說：

「……到南京才精呢，晚上檢查旅館，我們帶的箱子很多。憲兵說不要全查了。他只指定一個箱子，要我打開。不巧，那隻箱子裏面，偏偏有廣平的黨證在裏面。我想：這糟了，在他們開手翻檢時，我就在想主意，想來想去，只有一個陳公俠在徐州作師長。他總算孫傳芳的人，要是
有問題，只能打電報向他求救了。幸而，廣平的黨證，裝在空白信封裏面，沒有被檢出來……」
這可看出，當時他們兩人間的情感與關係了。

到上海後，先生走廈門，許廣平去廣州。一直到先生再由廈門到廣州。兩人又一同到上海，這些經過，也都在「兩地書」中表現着的。

到十六年冬，我去上海看先生時，當時他們兩人已居住在東橫濱路景雲里二十三號。許女士住三樓，魯迅先生住二樓。我到後，魯迅先生將二樓他的床鋪讓給我。他自己住到三樓去。第二天上午，許廣平拿一封信下樓來，交給先生，還說：——

「你看，她們多可惡，江紹源太太來信說，說她要改稱呼了。再不姊妹相稱。她要稱我師母了。」

魯迅先生笑了，還說：——

「那就讓她稱師母好了。有什麼要緊呢？」

我當時也接着說：

「那我也改稱呼了」。

魯迅先生又笑了。而且笑的很響亮。許廣平女士却紅起臉說：——

「你們全可惡」！一下子跑出去了。

這時候，先生的家，雖依然還沒有小孩。但即使無客人，也有說有笑了。再不像在北平時那樣的悽苦與冷靜。而許女士幫先生抄校，整理，各種稿件同書籍。不特作了先生的妻，他作了先生的助手。我記得：在我臨走時，先生送我一本「小約翰」。上邊就有許女士用紅筆改校的正誤。

這裏，還要附帶一句：民國十八年九月，他們就生了兒子海嬰。

倘若家庭能影響一個人的思想同行動的話，那魯迅先生在北平時，無論是寫小說，散文，短評，論文，着重在對舊社會攻擊者，那他當時的婚姻同家庭，不能說毫無關係吧？而以後在上海，——尤其是臨死前數年，對於青年之指示方向，對於社會之開闢新路。誰又能說，與那有前進

思想，又能誠懇工作的許廣平，毫無關係呢？而先生本身，在絕望的家中同在有希望的家中的生活，那意義，也就不很相同吧？

魯迅論國父

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在北時，北京有一個勞動文藝研究會，召開了一次負責人會議，由毛壯侯提議：「在勞動文藝週刊」上，出一個歡迎孫中山先生專號。這議案，在唇槍舌戰之後，終於打消了。其理由是：中山先生雖是革命者，然而與勞動文藝無關。

殆中山先生逝世後，各報章，雜誌雖多有紀念文字發表，但「勞動文藝週刊」，還是沒有紀念中山先生文字。有一天，我將這情形，告訴了魯迅先生，並問他，究竟勞動文藝上應不應該歡迎或紀念中山先生？魯迅先生是這樣答覆的：——

「毛壯侯主張出專號，固大可不必。因為一出專號，對於政治沒有興趣的人，他一定不要看，反而減少宣傳力。紀念或歡迎文章，是可以登載的，中山先生雖不是文藝家，更不是勞動文藝家，但中山先生創造民國的功勳，是值得紀念，也值得歡迎的。那麼；對於中國勞動者，介紹一下中山先生，不是應該的麼？胡也頻他們，也太重視文藝二字了。還是上了「爲藝術而藝術」的當」。

這，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對於中山先生的態度。

因為魯迅先生記住了中山先生的功勳。所以對於中山先生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便寄予最深厚的同情與希望。國民黨民國十四年在北平創辦機關報「國民新報」時，魯迅先生不特應了主持人邵元冲之約，常有稿寄去，還介紹了章素園前去編副刊。這是衆人週知的事情。而十四年，魯迅先生寫信給許廣平女士信中，還說過這樣的話：——

「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是他沒有黨軍」。（見全集兩地書五十六至七頁）

這不僅是同情，還代中山先生作參謀，如果中山先生在民元讓總統於袁世凱後，即開始練黨軍。——中山先生本早有此意，見於他的遺著中，他曾說過：他如果能練好十萬黨軍，三年內，他絕對統一中國。——則後來之「洪憲元年」，「張勳復辟」，以及十多年的軍閥混戰，恐怕都不會出現罷？這證明：魯迅先生對中山先生的出主意，是絕對正確的。

不止此也哩，魯迅先生對中國國民黨。亦一樣的出過主張，其證據如下：——

「本校學生中，民黨不過三十人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開會，覺得他們都沒有歷練，不深沉，連設法取得學生會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見全集兩地書二）

五〇頁

魯迅先生看見了另一面對新興勢力的暗中打擊，又看見這些青年黨員，拿不出對付的辦法，竟急得在旁邊直躁腳，這種情見乎辭的同情，恐怕不是一般指魯迅爲「反動文人」的人，所能想到吧？

因爲魯迅先生對於中山先生及其國民黨，寄有深厚的同情與希望，所以在中山先生逝世後，段祺瑞竟藉故穿不上靴子，不去吊祭。「現代派」的教授們，說中山先生太相信俄國，以致減低信仰，等等奇形怪狀的事件與議論，竟激怒了佩服中山先生的魯迅。「戰士與蒼蠅」，馬上發表出來：——

[Sgt. Ppdinner 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却見得愈大。

「正因爲近則愈小，而且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

「戰士死了的時候，蒼蠅所首先發現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噁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營營地叫

，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他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現過蒼蠅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全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魯迅先生這憤怒，是火一般的熱情，他看不慣那些貪官污吏，軍閥學匪，污蔑中山先生，以他出來講話了。看他「集外集拾遺」六六八頁，他說什麼話。

「所謂戰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國元年前後殉國而反受奴才們譏笑糟蹋的先烈」。

這，就證明「戰士和蒼蠅」，是為什麼而寫的。

因此，在中山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的時候，北平「國民新報」上，就有魯迅先生的文章，他說：——

「凡有自稱為民國的國民，誰有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

接着，他又講出：中山先生的特性來：——

「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败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着進向近於完全的革命工作，其到臨終之際，他說道：——

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魯迅先生是不是同一般文人一樣，來作應酬文章呢？不，魯迅先生絕沒有對任何人恭維像恭維中山先生一樣，他是記得中山先生創造民國的功勳，他看見了中山先生雖在民國成立之後，還繼續着革命，甚至中山先生臨死時，還是革命，所以魯迅感動了，他說：——

「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西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藥了，但中山先生不贊成，以爲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效的，診斷的智識却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當潮危之際，大抵是什麼也肯嘗試的，而他對於自己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志」。

魯迅先生所舉，雖然是瑣事，但惟其是瑣事，所以格外顯得中山先生的偉大，故終魯迅先生一生，對於中山先生，無論在言談上，文章中，都沒有送過微辭。再看魯迅先生對中山先生所下的結論罷：——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上三段國民新報之文章，見全集集外集拾遺七—三頁）這就是魯迅先生眼中的孫中山先生。

魯迅回憶斷片

80

「吶喊」自序索引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魯迅先生的第一集小說——「吶喊」，被他的令弟×××編定後，魯迅先生寫了一篇「自序」。

這「自序」，將他創作的過程及動意，全盤講出來了。所以，在他第二集小說——「彷徨」出版時，魯迅先生再沒有寫序或題記一類的文字，僅引了屈原的「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國；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以表示他寫「彷徨」時的心情。這，可以看出：「吶喊」「自序」，在先生的創作活動上，是怎樣的重要了。

現在，為研究者方便起見，將個人所得的資料，在此索引一番。

「我在青年的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自序」，一開頭，先生就這樣告白着。但這裏之所謂「夢」，不是「在朦朧中，見一個好的故事」。（全集一卷四六〇頁）不是「夢見自己在冰山間奔馳」。（全集一卷五〇三頁）不是「夢見自己在險巷中行走」。（全集一卷五〇六頁）不是

「夢見自己躺在床上」。(全集一卷五〇八頁)不是「夢見自己正和葛陂對立」。(全集一卷五一頁)更不是「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向老師請教立論方法」。(全集一卷五一七頁)然而；也不是「夢見自己在做夢」。(全集一卷五一三頁)可是，也不是「夢見自己已死在道路上」。(全集一卷五一九頁)先生的「夢」，照先生自己說：「後來大半忘卻了」。但先生仍在記憶中，顯示給我們了。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然而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燄和毒，恢復和報讎，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全集一卷四八一頁)。

這就是先生所忘卻的「夢」，但實在，先生並未忘卻，先生是：「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不願追懷」，(全集一卷二七三頁)所以才那樣說。因「血和鐵，火燄和毒，恢復和報讎」，都穿起花籃的衣裳。另以喜面出現了。先生只能在沉默中將夢消化。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一八九三年先生的爲官的祖父介孚公因事入獄，家產中落。先生之父伯宜公又生鼓脹病。斯時，先生年僅十三歲，按理：該是不問家事的，但先生家中，再無對外之男人。於是爲長子的允

生，便負起了重擔。天天爲父親張繡治病。寫在「朝華夕拾」裏，會有下面似的文章：——

「我曾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整年，因爲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的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有名，但還不至於鬧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卻已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可是那時的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全集二卷三九二頁）。

這樣，隔一日的診金，與每天的藥錢，使先生不能不常常出入於質鋪，但伯宜公的病，雖經紹興城那樣的名醫診治有兩年，而「水腫是逐日厲害，將要不能起床」。（全集二卷三九三頁）於是又由另一個名醫陳蓮河來診治，診金仍是一元四角一次，仍是隔日一診，而用「藥引」之奇特，雖不像第一位名醫，要用什麼河邊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但蟋蟀要用原配的一對，要用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平地木十株」，另外還加什麼丸，什麼散。但治來治去，伯宜公的病仍未見好，不過是要病人家裏多花幾文錢，要病人多受幾天罪，伯宜公在一八九六年，陰歷九月初六日，終於故世了，魯迅先生那時已有十六歲。

「我與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走異路，逃異地，去求別樣的人們，……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進了K學堂了」。

先生原選的是紹興城中西學堂。

「但我對於這中西學堂，卻也不滿足，因為那裏面只教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功課較為別致的，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然而學費貴，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全集二卷四〇二頁）。

先生既不滿於中西學堂，又為經濟所限制，於是冒當時社會的鄙視，依然跑向南京去。因為在南京之江南水師學堂，正在招考。而且完全是官費。在校學生，除由公家供給書籍，服裝，伙食外，每年還有二兩銀子。（最初三個月試習期內是零用五百文）但這學校僅只披着新鮮的外衣，骨子裏還是什麼「甄考叔論」，而且新進的學生，又受高年級學生欺侮。先生乃於次年又改入仍在南京，而且係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鑛學堂了。

路鑛學堂一直停到畢業。先生每次在校試驗，都名列前茅，故畢業後，學校預備派人到日本留學時，先生便是五名中之一。

一到日本，先入東京弘文學院習日文，這是一九〇二年初春的事情。

先生幼時，因為父親的病，受了那樣打擊，覺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大半發

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此，先生在學習了日文之後，「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

這裏所謂「鄉間醫學專門學校」，就是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這是在離開東京弘文學院時進去的，時間是：一九〇四年暑假。據「華蓋集續編」裏講：——

「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餘」。〔全集三卷一八五頁〕

在清苦的生活中，先生仍是勤勉而用功。而且竟因功課成績太好了，引起日本人的妬嫉。這寫在「朝華夕拾」的「藤野先生」裏，已經明明白白了。但這學校，也終於未曾使先生完畢了學業，其原因，「自序」很了然。不再曉舌了。

先生棄醫由仙台而返東京，這是先生走向文藝領域的開端。這裏，我覺得：很應該感謝那日俄戰爭有關中國俘虜影片的放映。倘使先生不受那刺激，以醫終其身，先生雖能為中國醫學界盡不少力，但大不了能多救幾十幾百，甚至幾千個不死不活的人。於中國，損失太大了。

到東京，先生便張羅出雜誌，一提倡，還有若干應和者，待到真要實行工作了。「最先就隱

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而最後，還是原先發起的三個人：魯迅，×××，許季滂。然而：這三人，又是「不名一錢的」的。先生便遇到意外的寂寞。

但這寂寞並沒有使先生消沉下去。先生在東京，仍給國內出版的河南雜誌撰文，復從章太炎先生學小學。還翻譯小說。直到一九〇九年六月，才回國。

回國後的先生，仍未能全心致力於文藝工作。爲了謀生，先作教員，作學監，作校長，到民元革命後，南京政府成立。先生應蔡子民先生之邀，復任教育部部員，俟後教部遷北京，先生才隨之移北京任事。即居住北平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即「自序」中所謂「S會館」者。

此時，先生多致力於古籍的鑽研：纂輯謝承後漢書，校穆康集，研究佛經，輯會稽郡改書，刻百喻經，蒐集金石拓本，研究造象墓志，故他的老朋友金心異——即已故北大教授錢玄同先生，找他時，兩人便有下列的對話：——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魯迅先生答應了，於是錢玄同陳獨秀等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第四卷第五期。便出現了魯迅先生的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一九一八年四月間的事。先生那時是：三十八歲。

由此開頭，先生不特寫小說，如「孔乙己」，「藥」，「明天」等等，還寫論文，寫短評。現在一般人論到五四時代的「新青年」，幾乎離不開先生，可見先生當時工作之勤了。

先生爲什麼要如此辛勤地工作呢？

先生自己說：——

「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這是一九二二年——即民國十一年時的魯迅先生。

一九四二·二月·賴家橋·

「金心異」考

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上，說：他的寫小說，是受了他的朋友金心異的勸誘，此後便源源寫下去。根據此話，我們可以說：魯迅先生從答應了金心異那一天起，發揮了後半生全部精力，奠定了中國新文學基礎，使中國文壇光輝而發煌起來。金心異算是第一個有功的人了。

但，金心異是誰呢？他爲什麼有那樣大的力量，能使已經決定在寂寞中腐蝕自己心血的魯迅，忽而起來吶喊呢？

金心異即已故北大及高師等校教授錢玄同。是音韻學專家，但他同胡適之博士一樣，有歷史癖，對於中國古籍涉獵甚多。因爲涉獵多，又有識見，他發現古籍中偽造的東西太多了。於是引起他的反感。不特文字上，口頭上，對古代社會的文物制度起了懷疑，甚至連姓都廢除，改爲「疑古玄同」。曾經風靡一時的語絲週刊，其名稱與刊頭，就是「疑古玄同」起而又寫的。

可是，姓錢名玄同的人，爲什麼稱爲金心異呢？是他本人常用的筆名？抑是魯迅先生隨便代他造個名字呢？原來是這樣的：——

錢玄同當時，正在與陳獨秀，胡適之一般人辦新青年雜誌，不祇提倡白話，還反對古文，這却惱怒了當時的古文家林紆——林琴南。這位林先生很奇怪，他不大高興同新青年一般人作論辯。他在上海新申報上做起小說來。拿小說來影射一般提倡白話文的人，專門痛罵。當時他做的「天夢」，「荆生」就都是罵人。「天夢」不必說，「荆生」一篇裏面，就用元緒影射蔡元培，陳恆影射陳獨秀，狄莫影射胡適。而錢玄同，被名爲金心異在這裏出現了。從此，金心異之名，就在新青年雜誌一般人口上掛了許多時候。

魯迅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開始寫時，是一九一八年——即民國七年四月，當時正是「新青年」倡導文學革命論戰正熱鬧的第四卷。魯迅爲了不使編者感到寂寞，從此開頭，便在「新青年」上大寫文章，小說之外，還寫了許多的雜感和論文。可以說是「新青年」重要的戰鬥員之一。故當時「新青年」的編輯會議，魯迅也嘗時參加，對於金心異之名，也是常時掛在嘴上的。而錢玄同不特同他同事，又還同鄉，過去又還一同受業於太炎先生帳下。他們倆人又好互開玩笑。（曾憶：在北大教員休息室裏，錢玄同有一天對魯迅說：他的兒子那樣小，居然也會玩滑頭鬧戀愛。魯迅就開玩笑地說：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而錢玄同馬上就向當時還不曾生兒子的魯迅反攻，說：有的人是將這套把戲永遠保持着，留給自己用，連後都不想傳呢。當時兩人好開

考「異心金」

玩笑，可見一般。）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即民國十二年，「吶喊」要付印時，魯迅在自序裏便把「金心異」三個字拉出來了。不過，這一回，魯迅却沒有開玩笑的意思，因為他當時想起用什麼名字好代替，而既是小說，又不便用真名，便以這三字寫上了。魯迅那樣說。

一九四二，三月。

京報的崛起

孫伏園先生離開晨報館之後，即約請魯迅、周××、錢玄同等創刊語絲。這期間，還有一個刊物，成了那時期青年界的每日食糧，且又引起各種學術上的論戰，使中國報紙更積極負起傳播文化的使命，那便是孫伏園編輯的京報副刊及各團體代編的京報七種附刊。

當時正是民國十三年冬天，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北上，激起了北方青年界的行動，就是原是在苦悶中過生活的青年，聽了中山先生的言論同主張，不特明瞭了現實的環境，是漸趨滅亡的漆黑一團。還更明瞭了要改造——甚至打破這黑暗的環境，是非自己站出來領導羣衆、來作掃蕩工作不可，於是青年們，三三五五，結社了，入黨了。總之：不問思想上的目的如何，大家在衝破黑暗的現實這一點上，是需要集團的力量來發揮，開展。可惜的，是作為社會先導的報紙，在當時，還沒有一種能盡這種報導或指示的任務。

記得當時在北京的報紙，較為著名的，只有這幾種：晨報，黃報，京報，世界日報，順天時報。除順天時報，係日本機關報，不能作數外，其餘之黃報，京報，世界日報等，對於文化向來

很少起過作用。會憶他們的副刊，多半還是風花雪月一般鴛鴦蝴蝶派人的馳聘所，晨報雖然在五
四後，添了新副刊，專登學術及新文藝作品。但時代已將牠向後揚棄了。因為晨報後台老闆研究
系人物，雖可在北洋軍閥面前大談科學與文藝，但中山先生的北上，及他所帶來的政治主張與思
潮，已使晨報老闆有些恐慌了。於是他們不滿於再起的青年運動。更不滿於孫伏園所編的副刊。
因為當時副刊上，不祇是登些辛辣的文藝作品，有時還登載批評政治，批評社會的雜感與論文。
在這種形式下，伏園便被迫而離開晨報了。其詳情，已見於語絲的發刊中，這裏不再說了。

伏園離開晨報，是由魯迅先生報道出來的。那是有一天，魯迅先生到世界語專門學校來上課，在講完講義之後，魯迅先生忽然說：——

「我打掉了一個人的飯碗，」接着他講了伏園在晨報館辭職的經過。最後，好像安慰大家似的，說：「我們現在另外辦一個週刊，幾天就可以出版了」。

我在聽了先生的報道，當天晚上，就去告訴胡也頻同項亦愚，因為當時，我們三個人正在編輯勞動文藝週刊。而勞動文藝是京報館代為印刷，不要我們出錢的。（每期印一千份）因為同京報有這個關係，我們當時對於京報很關心，時時向京報主人邵飄萍先生，提供改革意見，這一次，聽見孫伏園離開晨報了，很想要京報創刊一個副刊，請孫伏園作編輯，三個人談論的結果，覺

得這辦法很好，但有問題的，是京報請不請孫伏園呢？假使京報願請孫伏園，而孫伏園又肯不肯幹呢？兩方面都沒有把握。因為我們曉得：京報本來有副刊，不過牠的副刊專登些賞花或捧女戲子的文章，而編此副刊者，又係與邵飄萍很有交情，且在京報服務多年的徐凌霄。那麼，邵飄萍肯不肯停了徐凌霄所編的副刊，而另請孫伏園呢？而且伏園本人，我們都不認識他，萬一邵飄萍答應請他。誰又有方法也使他答應呢？但即就是有這些困難吧，我終於大膽地找邵飄萍去。

我對邵飄萍述說了孫伏園向晨報館辭職的經過，並告訴他京報應該借此機會，請伏園代辦一種副刊，意外地，邵飄萍馬上首肯了。而且他還說：——

「我想：除請孫伏園先生編副刊外，京報還可仿照上海民國日報辦法，再出七種附刊，每天一種，週而復始。這樣，可以供給一般學術團體，發表他們平素所研究的，專門學問。」

「能這樣，當然更好。」

「那麼，我們就這樣決定：本報副刊，就請貴友孫伏園先生担任編輯。另外，七種附刊，請你設法相幫我二兩個，我這裏也有幾個團體接過頭。本報也預備出一種圖畫週刊，大約七種附刊，不會成問題。」

這真使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京報願擔負起提倡新文化的使命。但伏園，在當時

，不特不是「我的朋友」，是連一面之緣都沒有，這却不能不使我恐慌起來了。

我抱着這種矛盾的心情，走出京報館的門，看時間，已是夜裏九點鐘了。想着：魯迅先生還未到睡覺期間，還是找他商議罷。

這件事，也是出乎魯迅先生意外的，所以在我講完了見邵飄萍的經過，並說明我根本不認識孫伏園時，魯迅先生這樣說：——

「不要緊，我代你們介紹。我想：伏園大概沒有問題罷？他現在除籌辦語絲外，也還沒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去找他來。你明天晚上到我這裏吃晚飯」。

我這一次，却是抱着愉快的心情走回去。第二天，也將這經過，告訴了胡也頻與項亦愚，自然在吃晚飯前，趕到了魯迅先生家裏。會我久已仰慕的孫伏園先生。

要解決的事件，魯迅先生早已同伏園說過，所以我也不必再重覆，吃飯時，伏園就首先告訴他已同意。我說：——

「那麼，我明天告訴邵飄萍，再同他約好時間，你們先見見面」。

「那又何必呢？」魯迅先生放下酒杯，突然插言，「邵飄萍是新聞記者，一天到晚，跑來跑去的，你我他，還得找伏園。有多麻煩？我看吃完飯，你們倆去看他，一下就決定了」。

伏園看着魯迅先生這樣力成其事，他當然也不好示異意，所以他接着說：——

「這樣也好，那又何必煩勞你跑一趟了。」

其實，不必說跑一趟，就是跑十趟，我也是願意的。因為事情能成功，我們就可以看到一般學者及文人的高論與出色的創作。而我們一般青年，也可以有發言的地方了。於是一吃完飯，我就同伏園趕到了京報館。邵飄萍剛好正在館。

飄萍熱烈地歡迎伏園進京報館，在談過辦法，薪俸，稿費等條件後，飄萍還說：——

「那麼，我們現在就開始籌備罷。下一星期出版。」

過了幾天，晨報第一版廣告欄，出現了一個以二號字為標題又為正文的長條簡單廣告，說京報將於某日發刊副刊按日隨報附送的小廣告。到十二月八日，京報副刊即在孫伏園主持下與讀者相見了。

京報副刊的出版，在當時並不能算是小事。由出版之日起，京報的讀者，就開始增加了。一天比一天多，記得增加最多的，是說有一天增加了兩千份以上的訂戶，印刷所加工了，送報的加人了。飄萍有一次對我講：印刷工人同發行部人，竟發出怨言，說：「這樣加下去，怎麼得了呢？」這雖然表示出：中國人對於本身所負的事業，向來不求發展。但當時，印刷還未利用電機，再

加以人事組織不很健全，却也實在難怪他們。不過從這一點，倒可看出：京報副刊影響之大了。京報副刊一出版，爲什麼就會發生這樣大影響呢？這，就是從魯迅先生講起。

過去魯迅先生在新青年雜誌，晨報副刊，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所發表的短批，論文，詩歌，小說，已引起廣大的注意。到民國九年一月，他又譯出了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戲劇「一個青年的夢」。同年十月，譯出了俄國阿爾志跋綏夫的「工人綏惠略夫」。十一年五月譯出了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童話劇「桃色的雲」。十二年九月印行了小說「吶喊」。同年十二月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十三年六月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同年十月譯出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

從這裏可以看出：在京報副刊未出版前，魯迅先生已經有那樣多的譯著，流傳到社會上了。這些譯著，包括了先生的當時及其前後的思想，包括了先生治學精神，包括了先生文筆技術。而同時，先生又兼任着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及女子高等師範，世界語專門學校等校講師。他的言論主張已經在青年界發生廣大信仰了。晨報的漸趨灰色態度，已爲青年所不滿，而伏園離開晨報，又爲魯迅先生稿子所引起。現在聽說伏園要爲京報編副刊了。那麼，魯迅爲主要撰稿人之一，是絕無疑問的。拿語絲爲伏園所發起，創刊號上就有魯迅的文章來推測，也不會例外。要看

或必須魯迅文章的人，就紛紛訂閱京報了。事實是：魯迅先生他沒有使青年人失望，自京報副刊發刊後，魯迅先生對於時事及學術，社會，文藝各方面，都有文章發表出。而最引起廣大注意而得到各種反響的，是青年必讀書問題，翻譯問題，女師大風潮事件，開封鐵塔強姦事件，就都是魯迅先生在京報副刊上發表鋒利的短評而引起檢討的。記得當時在京副刊上，魯迅先生除譯荷蘭的短篇，日本的短篇之外，以「咬文嚼字」為題，以「忽然想到」為題，以「並非閒話」為題，就發表過一二十篇文章，特別是「忽然想到」，竟寫過十一次之多。而對於中國的政治問題，考古問題，創作問題，社會改良問題，……都表示過獨到的見解。

因了魯迅先生，這樣熱心在支持京報副刊，再加以當時在文藝界很享盛名的周××等，也都常有文章發表。京報的銷路，便不徑而走了。

魯迅先生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中說：——

「……至於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會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

事實是：晨報向伏園去說和，是在京報副刊出版之後，其原因，是在京副，而不在語絲。因

爲當時青年界，大抵都是看報的。看精彩的文章，固然是原因，但當時的青年，對於國事，已很關心了。對於報紙的時事新聞，亦非看不可。伏園離開晨報之後，晨報上的文章，固然不及語絲，但語絲却沒有時事新聞。在未有其他報紙能代晨報以前，晨報是不會受什麼影響的。當然沒有向伏園說和的必要。待京副出版，青年人有了代替的讀物，於是紛紛退晨報而訂京報了，拿京報當時那樣突然增加銷路。甚至一天加到幾千份，我們就曉得：當時晨報每天紛紛退報，甚至一天被退幾千份，我們是不難想到的。報紙要沒有銷路，自難在社會立足，所以伏園離走時，本是同晨報吵架而走的。後來晨報居然託人向伏園說和，其狼狽情形，也不難想像。因爲當時青年，既感於智識飢渴，想多看一般思想界先進的文章，又感於晨報之態度漸趨灰色，引不起興趣，（甚至激起反感）乃才退掉晨報而看京報，魯迅先生恰巧又是京副寫稿人主要之一。於是京報風靡北方了，終至發生「紙貴洛陽」現象，因爲牠在文化上實在起了重大作用。這雖是客觀環境所形成。但作此環境推動者，魯迅實是第一人。

至於京報所附出的七種週刊，這裏暫保留罷。

一九四二、七月二十四日

哈哈論的形成

一九二五年七月，魯迅先生在語絲週刊上，以「立論」的題目，寫下了這樣的文章：——

「我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向老師請教立論的方法。

「難」——老師從眼鏡圈外斜射出眼光來，看着我，說。「我告訴你一件事：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諾。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你……」

「我願意既不謊人，也不遭打。那麼，老師，我得怎麼說呢？」

「那麼，你得說：「啊呀！這孩子呵！你瞧！多麼……。啊唷！哈哈！Heh！heh！heh！heh！」

——（全集一卷五一七頁）

這是魯迅先生發明的有名的哈哈論。但這哈哈論的形成，據魯迅先生講，是這樣的：——

民國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暑假，陝西督軍劉振華氏，代表西北大學向北平各大學校教授及各報記者，請求前往西北大學講演。當時魯迅先生便是被聘請中的一位。魯迅先生因從來沒有去過西北。很想藉此機會，去看一看。當時同去的，京報社代表是該報記者王小隱。（孫伏園那時是代表晨報社去的）據魯迅先生回來時形容，王小隱那次是穿的雙襪鞋——即鞋面前頭有兩條鼻樑。當時北京官場中人及遺老多穿此種鞋。——一見人面。總是先拱手。然後便是哈哈。無論你講的是好或壞，美或醜，是或非，王君是絕不表示贊成或否定的。總是哈哈大笑混過去。魯迅先生當時說：——

「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論過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贊成，又是否定。似不贊成，也似不否定。讓同他講話的人，如在無人之境」。

於是才寫了那篇「立論」。

事實是：今天天氣哈哈論，先生一從長安回來就想寫，我們看論文「墳」裏面的「說胡蝶」，開頭是這樣：——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里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纔慄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

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麼可談呢？」

底下，先生寫他在長安所見的奇聞與奇談。先生且感慨，無論你講真話或者別的什麼，旁人總以為是哈哈的笑話，先生於是接着說：——

「凡對於以真話為笑話的。以笑話為真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於是我從此不多說話。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噲，噲，……今天天氣多麼好呀？……」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見全集一卷一六〇及一六三等頁）

這裏也可以看出，今天天氣哈哈，是在游長安時才在先生的思想中具體化。因為王小隱君代表了這個典型，在魯迅面前活現了。

註：魯迅全集三卷六七頁，有「五月十二日京報的「顯微鏡」下有這樣的一段：——「某學究見某報載教育總長「章士鈞」（案：鈞原為鈞字）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聖人之徒也。豈能為吾儕衡古文之道者乎！」——所謂京報顯微鏡，即王小隱所主編也。

魯迅回憶斷片

語絲的發刊

民國二十三年，在北京學界——即今稱文化界——最佔勢力的報紙，——即銷路最廣，影響最大的報紙，要算研究系所辦的晨報了。因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後，晨報便添設了副刊，除報導時事新聞外，還刊載起有學術性研究文字與文藝作品，而當時執筆的，又多為有權威的學者，及提倡新文化的教授，故北方——尤其北京——學術界，無論教授與學生，大半多看晨報，而主編晨報副刊的，是副刊編輯專家孫伏園氏。

伏園是魯迅先生的學生，在他編輯副刊時，便常常請求魯迅先生寫稿子，我們曉得：魯迅先生馳名於國際文壇的作品，而曉得已有十四國文字翻譯的「阿Q正傳」，其開始，就是發表於晨報副刊的。

因為伏園時時請求先生代副刊寫文章，所以先生在民國十三年十月裏，寫了一首諷刺當時盛行的「阿呀阿唷，我要死了」的失戀詩。題為「我的失戀」，以「某生者」署名，寄給伏園了，伏園是認識先生的筆跡的，雖以「某生者」名字出現，伏園還是曉得是誰寫的，便立刻發排於

副刊了，可是，這時的伏園，在晨報館的地位，誠如魯迅先生所說：——

「……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其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全集四卷一七〇頁）

這位留學生，名叫劉勉已，當時剛剛榮任晨報總編輯之職，在不滿意於副刊存心的藉口下，待伏園發過稿子走掉後，他跑到排字房檢查副刊的稿子了。恰巧就看見魯迅先生以「某生者」筆名寫的那篇「我的失戀」詩，於是他以「不成東西」為理由，不得伏園同意，就將那篇稿子抽掉了。於是便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全集四卷一七〇頁）

伏園辭職之後，第一感覺到的，就是非弄個事情作作不可。第二是：常寫文章的人，忽然沒有合適的發表地方，也有些不舒服。因為當時的北京，雜誌是意外地少，努力評論，是胡適之先生發表政論的機關雜誌，剛出版的現代評論，又是有政府靠山的宣傳機關。至報章，雖然已經都

有了副刊，但順天時報副刊，是爲日本而說話，邵飄萍的京報副刊，是專捧女戲子，黃報副刊，就是專登那「阿呀呀，我要死了」的發源地。鬧得當時原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作品的人，簡直沒有插足的地方了，於是本來閒不住的伏園，在打聽過報紙四開大的刊物，如印二千份，紙張印刷共總不要十元錢。於是便像魯迅先生所寫的下面的事出現了。

「我很抱歉伏園爲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吶喊」。至於投稿者，倒全是他獨自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週刊便在北京——尤其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同上一七一頁）

不錯，語絲的發刊，完全是由伏園發起的，而且所謂邀來的十六人，（連伏園在內）便成了語絲社的社員，那十六人是：孫伏園，周××，魯迅，李小峯，錢玄同，劉半農，章衣萍，章川島，魏建功，許欽文，顧頡剛，王品青，林語堂，江紹源，俞平伯，張定璜。這十六人之中，寫稿最多的，要算周××與魯迅了。魯迅先生所謂，「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如李小峯，魏建功，許欽文，似乎就很少或者竟未寫過稿。

但語絲畢竟發刊了。在民國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號便與世相見。

。創刊詞上曾經這樣說：——

「我們幾個人發起這個週刊，並沒有什麼野心和奢望，我們只覺得現在中國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沉悶，感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幾句話，所以創刊這張小報，作自由發表的地方。……」

我們並沒有什麼主義要宣傳，對於政治經濟問題也沒有什麼興趣，我們所想的只是想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終是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

我們這個週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

週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簡短的感受和批評為主，但也兼採文藝創作及關於文字美術和一般思想的介紹與研究……」

創刊詞本來是請魯迅寫的，但魯迅先生是一向不主張刊物上有堂皇的宣言的。故這篇創刊詞，終於由周××執筆，但她——語絲——的發刊名目的來源，還有一點小小逸事，魯迅先生這樣說：——

「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同上二七一頁）

這是因爲想不好名稱，由錢玄同先生出的把戲，順手拿一本書，用指頭點下去，便得了語絲二字，同莽原出版時，向培良由書上點出莽原二字一樣。不過稍有不同的，是莽原被向培良點出，我却找了一個八歲的小孩寫了報頭，而語絲便由點着錢玄同，親自寫出報頭來了。

魯迅先生說：——

「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線；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同上卷同頁）

這也是事實，記得語絲指責梁啟超的關於玄學方面的妙論，社員中就不贊成，語絲諷刺現代評論派陳西滢等人時，社員中也有人不贊成，這，那裏能說得「統一的戰線」？或相同的意思與態度呢？而況語絲一開頭，就收外稿，如努力評論主幹胡適之，新月派主幹徐志摩，猛進社主幹徐旭生，在前十期中，就都有文章發表過。爾嗣後投稿之廣泛，可以說包含了當時全中國文藝社團中的份子，舉例如，後期創造社或洪水社的王獨清，穆木天，潘梓年，潘漢年等，莽原或未名社的台靜農，李舜野，章素園，章叢蕪等，莽原或狂飈社的高長虹，向培良等，現在戰國派文人沈從文，禮拜五派的張若谷，以及孫福熙，李金髮，姚蓬子，王魯彥，柳亞子，李健吾，佩弦，簡又文，陳學昭，汪靜之等等，就都在語絲上出現過。而且潘梓年，簡又文，陳學昭，穆木

天，柳亞子，姚蓬子等，又還不祇一次呢。

這樣，語絲不特說不上戰線的統一，就是說同人雜誌，亦勉強了。所以原有社員中，也有些人不大常寫稿了，故魯迅先生說：——

「……有些人們，大約開始是只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却連一個字也不見了」。〔同上卷同頁〕

這大約是收外稿的原因之一罷？發起人孫伏園，在第一期上寫過一篇記顧仲實，第十二期上寫過親送語絲記，第五十二期上寫了語絲的文體，再不見他的筆跡了，當時的情形是：伏園既編輯京報副刊，便不大再過問語絲，於是先少了拉稿人。外邊有稿子寄來，李小峯一律送給周××看，決定登載與否。於是除李小峯請章衣萍陪他時常請魯迅寫稿外，周××成了固定的編輯，小峯担任事務，而常常寫點文章的，除魯迅周××外，便只有江紹源，錢玄同，劉半農幾個人了。

依當時的情形，魯迅先生除每天要到教育部「轉一轉」即辦公外，還担任有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女高師，世界語專等校課程，而先生自己，則又主編莽原週刊，代民衆文藝週刊看稿，還時時應伏園之求，為京報副刊寫稿，既忙於時間，又不是沒有發表的地方，為什麼特別為語絲要

比其他社員熱心寫稿呢？據先生自己說，是這樣的：——

「當開辦之際，努力確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峯和川島，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眾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只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於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同卷一七二頁）

因此，從語絲的發刊，直到在北平被封為止，除因先生赴廈門，略有間斷外，幾乎每期都有先生的文章，除論文，翻譯，短評外，野草全部，幾乎都是在語絲上發表的。

因為有魯迅及周作人（當時周作人是在文壇負盛名的人，不似今日作漢奸之周作人）等幾位的努力支持，所以語絲的銷路，一期比一期好起來，由一千五百份，而兩千份，而三千份再後是五千到八千，她的影響，當然是很大的。除觀察深刻，文字簡練，見稱於時外，所謂隨筆，所謂幽默，就都是由語絲而發煌起來。但在社會及對於文學上的意義，她還不祇此，曾憶：她介紹過西班牙及希臘的民歌，太平天國的文學，希臘的陶器畫，孫中山先生早年的政治主張，文豪如託爾斯太，契珂夫，莫泊桑，高爾基等，她又指責過：日本順天時報的怪論，南開學校的性教育，孫傳芳的三愛主義，執政府的大屠殺，現代評論的不現代。也討論了禮俗問題，思想問題，批評

問題，以及方塊字的存廢問題，並研究考證了外國的民情與風俗，以及蘇曼殊等人物。……凡這些，都在當時及其後來發生了很大作用，只要看她，既受警告，又遭禁止，就可想到一切了。

我以上所寫，是指在北京所發行的而言，這時期，除社員稿子投來，即由負事務責任的小峯發排，無所謂取捨外，外來稿件，是由小峯送給周××，自然，像魯迅所介紹的旁人的稿子，也大抵登載的，至於到上海復刊的語絲，那是由魯迅出名編輯的，魯迅先生已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中，講的够詳了。這裏只好「帶住！」

莽 原 時 代

五四時代的浪潮，慢慢退下去了。到民國十二三年，可以說是：文化界最黑暗的時期。以說是：文化界的黎明時期，因為五四時代的新人物，留洋的留洋，作官的作官，有的埋頭研究，有的投奔到主子懷裏去，在當時，繼續支持那精神的，便是魯迅先生。吶喊的出版，即其證。

吶喊給與中國文壇怎樣的影響，我不想多說。這已有批評家論列過了，我現在要說的，是吶喊的作者——魯迅先生，在吶喊出版後的行動同戰鬥！

當時，中國的文藝刊物，少到幾乎沒有，在北方，能容納文藝作品，而為青年所愛好的，是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在南方，除了創造以外，便是商務印書館以壓倒一切的姿勢，發行的大雜誌：小說月報，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等。

因為吶喊的出版，魯迅先生更為青年所愛好。於是編副刊的伏園，便三天兩天找魯迅先生為他的副刊寫稿，以滿足青年讀者的欲望。這時節魯迅先生剛剛搬進他用借貸而修蓋的新居，——

西直門內三條二十一號。魯迅先生文章寄出了，題目是：「我的失戀」，署名爲某生者。伏園還有什麼話說呢？他以愉快的心情。將稿發出了。因爲他的副刊上，又有魯迅先生的大作了。——雖然署名不是魯迅，而是某生者。

但麻煩出來了。晨報總編輯劉勉己，晚上不知爲什麼，去看了副刊的校樣，他認爲：「我的失戀」太不莊重。便不得伏園的同意，將「我的失戀」稿抽出來。勉己的人，忽然要勉到旁人身上。伏園憤怒之下，辭職了。爲的是：劉勉己剝脫了他的編輯權，抽掉了魯迅的稿子。

於是，語絲發刊了。

語絲的發刊，完全由伏園的辭職而起，由寫文章的人，每人拿出一部分錢，作爲印刷費。一方面，可使伏園有事作。一方面可使寫文章的人還一樣有地方寫文章。記得在第一期發刊。伏園與李小峯等，還親自抱着刊物，在真光電影院門前發售呢。

語絲一發刊，伏園在晨報辭職的事，被京報主人邵飄萍曉得了。便聘了伏園去，爲當時的京報，以消息靈通見長。故在政界上很有勢力，但因編輯方法呆板，又少學術。以在青年界，沒有引起注意，可是伏園一進去，情景便大不同了。當時報紙的銷路增。本人，都爲之吃驚，他看出了文化的力量。便約我去爲他計劃七種附刊。

天有一種週刊，一星期週而復始，這辦法，在上海民國日報實行過，但在北方，當時共出了文學，婦女，圖畫，戲劇，民衆文藝等等。俟後，因思想關係，我們很反子的戲劇週刊，飄萍很痛快地將戲劇週刊停刊，要我約魯迅先生，他很贊成，他當時說：「我們還應該擴大起來。你看，現代評論有多猖狂，現在固然有語絲，但語絲態度不能滿足青年人要求，稿子是豈明他們看的，我又不大管，徐旭生先生的猛進，倒很好，馬在戰鬥，我們爲他作聲援罷，你去同飄萍商議條件，我就寫信約人寫文章」。

第二天晚上，我們便聚集在魯迅先生家裏吃晚飯。當時到場的，我記得有：許欽文，章衣，高長虹，向培良，韋素園，等等。在我報告了同飄萍接洽經過之後，當時便想刊物的名稱。最後還是培良，在字典上翻出莽原二字，報頭是我找一個八歲小孩寫的，魯迅先生也很高興那種雖然幼稚而確天真的筆跡，次一個星期五，莽原第一期，就在京報發刊了。除隨京報附送外，另外還由京報贈印三千份，作爲寫文章人的報酬，這被贈送的三千份，是交由北新書局李小峯發賣的。當時莽原經常撰稿人有：魯迅，尙鉞，長虹，培良，韋叢蕪，韋素園，台靜農，李舜野，姜蕪，金仲芸，黃鵬基，等等。

當時北京正是黑暗時代，軍閥政客出賣着祖國，蹂躪着人民，摧殘着文化，但因中山先生的

北上同死亡，刺激着青年，震醒了青年。於是廣大的青年羣，活躍了。無論走到那裏總是三三五五的，在討論什麼，爭辯什麼。而所爭辯討論的，是魯迅先生的方法同理路。會憶：京報徵求青年必讀書問題揭曉後，爲魯迅先生的答案，曾引起廣泛的論爭。這論爭，竟延長了好幾個月之久。

在這種情形下，魯迅先生很難於再寫小說了。雖然他的彷徨已擺到街坊，但魯迅先生可忙不一場糊塗。每天要講課，要上衙門，要作戰鬥的雜文，要看各種各樣的小說，散文，詩歌，論文，還要校閱期刊的稿子，還要接待日夜不斷的青年訪客，可是，這也沒有累倒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每日以酒，以烟，以點心，（當時先生飯量是很小的）支持着身體，刺激着神經。野草裏面的大部分作品，就是這樣環境之下，完成的。而寫作的時間，又完全是在靜夜之後，所以野草透，充滿了嚴森之氣，不爲無因的。

然而，還有更壞的環境呢。

落伍的章士釗，作了教育總長了。活寡婦楊蔭榆，便謀得了女師大校長的位置。她的舉動，引起女青年的反抗，於是風潮暴發了。楊蔭榆惱羞成怒。便開除大批學生。魯迅當時該校的講師。對此處置，深表不滿。於是學生會的中堅份子，都來魯迅先生家裏來。

矯健活潑，常馳騁郊野，以
為樂。一則溫柔雅靜，喜深
居閨中，而自娛。二人雖趨
向不同，性情各異，然愛用
三花牌化粧品則一。
伊等常云：「……三花各種
香品，無不質地精粹。三花
香粉，細軟芬芳，牢固不脫
色。有各種，各極其妙。三花
胭脂與唇膏，柔滑滋潤，色
調自然，用後肌膚秀麗，馥
郁雅致，洵非普通化粧品
所能幾及。」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復興一版

魯迅回憶

著者 荊有麟

發行者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中正東路念九號
漢口 交通路
昆明 武成路



